

独立阅读

2009 年 4 月

细则

- 1、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2、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3、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4、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
- 5、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 6、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独立阅读网下载：<http://chinairr.com.cn/>。

执行编辑：苏小和、王晓渔、成庆、言一、汪伟

本期轮值编辑：王晓渔

助理编辑：李伟为

观察员：文学：朱 白（广州）、罗四鸽（上海）

经济：苏小和（北京）

文史：王晓渔（上海）

艺术：言 一（成都）、成 庆（美国·波士顿）

特约撰稿人：戴新伟（广州）、羽良（北京）、严飞（美国·旧金山）、刘柠（北京）、汪伟（上海）、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凌越（广州）、孙骁骥（北京）、张无极（北京）、朱航满（河北）

翻译：陈丹丹（南京）、吴万伟（武汉）

编者按：

这一期“独立阅读”的迟到，责任全然在我这个轮值编辑。由于编辑工作需要几个完整的工作日，虽然文章早已到齐，编辑断断续续拖延了很长时间才算完成。在此向读者和作者道歉。

虽然这是 2009 年 4 月的“独立阅读”，但是编辑完成已是 2009 年 5 月 4 日，这个日子的纪念意义不消多说。我们默默地纪念，因为有些纪念是无需说出口的。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经 济：苏小和

文 史：王晓渔

电 影：言 一

音 乐：成 庆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日 本：刘 柠

英格兰：孙骁骥

德意志：杨不风

书评

凌 越：勒克莱齐奥：永恒的漫游者

朱航满：我们的索尔仁尼琴

罗四鸽：塞林格与凯鲁亚克的两种“禅”

随笔

贾 葭：西洋海盗与中土山寨

影像

王晓渔：打毛线的屠杀者

孙骁骥：如何挠到公众的笑穴

译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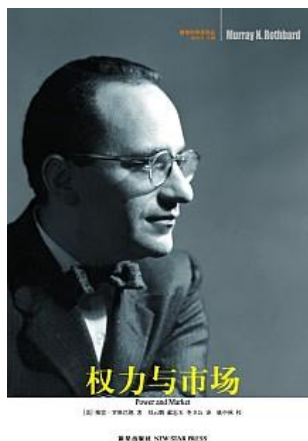
吉姆·霍特：你背诗么？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ECONOMICS 经济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 susumartin@hotmail.com)

最近一段时间,最大的财经事件,当然是荣公子智健的下台。我看见了他在媒体上的那张老迈又沮丧的脸,必然想起了他的父亲。人们记忆里的荣毅仁,一个俊朗得有些逼人的国家副主席,有几个人知道,在某个历史时期,他曾经在上海打扫厕所,而他的一个手指头,也曾经被造反的人们打断。



我想说的是,因为荣智健出事,我再一次拿起了罗斯巴德的书:《权力与市场》(刘云鹏等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8月)。在罗斯巴德的学术体系中,最重要的著作是《人、经济与国家》(Man, Economy, and State)。这本书完全继承米塞斯学术思想,尤其是米塞斯《人的行为》(夏道平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发展出来的“人的行为学”(praxeology)。罗斯巴德当年在这样的书里,在最后一部分对政府的全面干预进行了分类与分析。不过,在出版的时候,却被彻底删除。一直到1972年,才以《权力与市场》的书名出版。如同我以前阅读过的罗斯巴德一样,这位市场经济最彻底的捍卫者,依然把他分析的锋芒指向了各种形形色色的政府,并毫不留余地的认为,即使关于经济的防卫和强制执行,也可以由自由市场来提供,在这样的领域,政府行为依然毫无必要。沿着这样的路径,罗斯巴德为我们展示了政府干预市场的基本原理,并从价格、货币、税收、政府开支、行业垄断,专利、官员贿赂以及一种反市场的伦理学等不同的层面,对政府给市场造成的破坏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厘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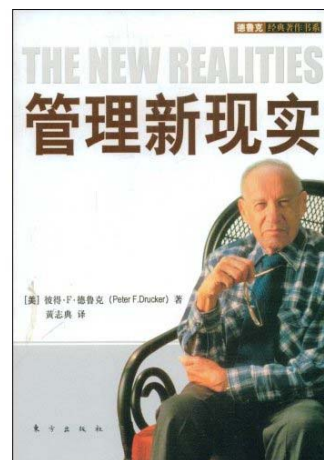
奥地利学派从米塞斯开始,一直基于人的动机和行为来发展他们的经济学体系,这种方法论能够迅速成为我阅读和思考的一部分。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我们都被漫山遍野的官商勾结弄得无可奈何,以至于人们相信这样的局面可能就是合理的,似乎离开了政府的干预,企业将无以为继,由此,官商结合成为中国企业最大的,也是最持久的发展方法。为什么会这样?事实上我发现人们对此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适应,事实上我更发现,几乎没有人这样的方法论中成功,所有人都是失败者,这甚至包括了政府本身。中国的官商结合是怎样一部漫长的历史,相信热爱阅读的人肯定心领神会。今天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对政府的依赖,几近于人们对水的依赖。可是这样的水却让人更加饥渴,而且随时都有断流的危险。

为什么会这样?罗斯巴德在经济学的层面为我们进行了深度分析。我们在历史上就一错再错,一直到今天也不愿意悔改。即使是荣氏家族,也是如此。

关于这样的主题,我看到德鲁克的新书《管理新现实》(黄志典译,东方出版社,2009年3月)也在尝试着去分析。国内很多人把德鲁克当成了管理学的宗师,事实上他本人更大的兴趣,显然超越了我们约定俗成的管理学,他是一个从企业出发,必然要思考人与国家的学者。所以我看到德鲁克提出了“政府的极限”、“新多元主义”和“慎防领袖魅力”这样的建构,并直接告诉人们,我们已经不再需要领袖魅力。

德鲁克当然是一名市场的拥戴者,他对企业的思考,从来都是在市场的层面进行。我们不知道荣智健这样的大企业家看过罗斯巴德和德鲁克没有。可惜他已经下台了。比下台更严重的,是警方甚至比证监会提前介入,搜查高层人员的办公室,带走大量的档案和证物。我看到公开的资料似乎在说,荣公子这次是涉嫌虚假陈述,串谋欺诈。如此醒目的罪过,估计要换来牢狱之灾。所以有人就叹息,荣公子这次恐怕是麻烦大了。

在香港,所谓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大致还是值得期待的。只是我不太明白,案情刚刚开始展开调查,为什么荣公子就被中信集团革职了呢?小道消息甚至说,荣智健是被最高层拍板拿掉的,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但一个道理众所周知,一家企业爆出丑闻,查找罪责应该是第一位的工



作，企业法人代表的去留问题，显然要稍晚一步，甚至是几步，而且去留的决定权，只能由企业自己说了算。

答案当然非常简单：一直以来，荣智健不过是中信集团旗下中信泰富的董事长，或者可以这样说，中信泰富真正的老板，是国家，是政府。这是一个公开的事实，只是多年来人们活在荣智健巨大的光环里，以为荣氏家族这样的表述，必然就决定了中信泰富是一家产权清晰的私人企业。事实上，虽然荣智健贵为董事局主席，但中信泰富(HK,0267)的第一大股东是“中信香港”，这是一家绝对意义上的大陆国有企业，而荣智健个人完全控股的“earnplex”仅拥有中信泰富 2.9 亿股股权，他只是中信泰富的一个小股东而已。

换句话说，中信泰富在产权结构上根本不属于私人企业，这么多年来，它一直私人企业为皮，国有企业为里，一直靠着庞大的政府关系，靠着庞大的国家资本，在市场上左腾右挪，做着并购复并购，多元复多元的生意大戏。

基于这样的产权结构，今天荣公子炒汇巨亏，拥有真正话语权的大股东拿他当祭品，于法，于理，都是必然的、合理的。毕竟，中信泰富是一家重量级的红筹公司，事关红筹公司在香港的形象；同时，荣智健如此重量级的人物，人人都知道他拥有深厚的政经人脉，他已经是政府多年以来培养起来的红筹公司代言人，他的身上押着全球投资者对香港红筹公司的投资信心。所以，大局发展至此，拿掉荣智健，当然就是政府必要的步骤。

事已至此，局外人还能说一些什么呢？

我想说，这可能是荣智健企业方法论最后的挽歌。我们所了解的荣智健，1978 年 36 岁的时候移居香港，靠着家里留在香港的 100 多万港币，创办爱卡电子公司，4 年后卖掉，获得 750 万美金。1984 年又创办加州自动设计公司，总投资 120 万美金，1 年后豪迈上市。这个时候的荣智健，是一名真正的私人企业家，身价逼近 4 亿。毫无疑问他是那种真正有企业家天赋的人，荣氏家族的企业家精神在他身上释放出巨大的光芒。我的意思是说，他应该沿着已经成形的私人企业路径继续发展，就像台湾的王永庆、日本的松下幸之助一样。可是荣智健没有这样做，他像他的父亲一样，选择了国家。1986 年，荣智健调转方向，投身香港中信，像他的父亲一样，一只脚踏在国家的船上，一只脚踏在私人企业的船上，他要把父亲遗留下来的政商结合传统发扬光大。



荣毅仁与荣智健

看到荣智健今天跌入险境，一名大致了解他的香港生意人这样跟我说，荣智健靠着国家发了多少财？地球人都知道。没有国家的支持，能有他荣氏家族财大气粗的景象么？凭心而论，这个人的话不无道理。他事实上是在批评在中国生意场上一直占据主流位置的官商结合的企业方法。这种方法可能会促使企业在短时期内高速发展，富可敌国，却不能在更长的历史时期内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很不幸，荣智健竟然成为这种短视的企业方法的牺牲品。我们看到，一种奇怪的格局由此形成：一方面是中信泰富的产权不清晰，荣氏家族仅仅是一名小股东，但另一方面，荣家的核心人员，包括荣智健的儿子和女儿，却又当仁不让地成为公司的管理核心。这种产权结构和人力资源结构上的二元背离，几乎就是中信泰富这些年热衷于企业并购、热衷于资本运作、热衷于炒卖外汇，热衷于赚快钱的制度性理由。

所以，我想说，中信泰富这些年的商业模式显然是事出有因，没有人能最终超越炙手可热的商业利益，荣智健下台，表明在一家国有企业内部，很少会有人站在国家的高度，民族的高度，道德的高度从长计议，人们必然只盯住快钱，这是人性的缺陷，我们所要做的，是通过制度设计制衡人性，而不是对人性的自私视而不见。荣智健的失败，事实上是国有企业模式的又一次失败。

最后，我还想说，今天荣智健的局面，可能是当年他的父亲埋下了种子。熟悉历史的人们依然记得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期那场声势浩大的公私合营运动，荣毅仁先生将荣氏家族的全部产业拱手献给了国家。现在我们已经无法体会当年众多

私人企业家的惊慌失措了，更多的商人死于非命，但是荣毅仁却奇迹般保全了自己。他选择了主动配合，带头发起上海工商业的公私合营运动。他不但做到了上海市副市长，还成为纺织部副部长。文革期间，他与中共高层领导良好的关系更保护他幸免于难。正如他自己所说：“因为我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自愿接受改造，在工商界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工作，我受到了政府的信任和人民的尊重，得到了荣誉和地位。从物质生活上看，实际上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得很好。”

荣毅仁这样说的时侯，他可能忘记了另外一个事实。由于私人企业产权被彻底破坏，中国经济陷入了两个死胡同，其一，是由于没有一批私人企业的支撑，经济开始彻底成为一个空壳；其二，新政府对私人企业产权的成功破坏，为后来的大跃进、大饥荒积累了可怕的方法论前提。而 1978 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如果在产权意义上加以分析，其实就是否定当年对私人企业产权的剥夺性政策，恢复个人的自由企业权利，用一批具体的私人企业弥补大而无当的计划和国有企业的虚妄的局面。

这正是 1978 年之后邓小平的经济思路之一。1979 年，荣毅仁终于等到了邓小平的邀请，出面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纵观当时的格局，惟有荣毅仁既有国际上的人脉，又有家族产业的积累，同时也与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荣毅仁也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在商场上的经验和才能。他敢于冲破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率先向国外发行债券，开展国际经济咨询、国际租赁、房地产商品化，与人合资购买外国卫星并争取到中国发射，在收购香港银行和公用事业的股权等方面也敢为人先。《纽约时报》曾这样描写中信公司：“在外国企业领导人眼里，中国金融界巨头——中信公司——有时似乎在各个方面与中国迥然不同：资本主义，大胆放手，讲究效率，重视赢利。”邓小平需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荣毅仁在资本和市场上的大作为为邓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大好见证。所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荣毅仁的政治生涯由此走向辉煌。1993 年之后，他贵为国家副主席，他的儿子荣智健在香港凭借政府资源和资本运作创建中信泰富，成为中国首富。失散多年的企业产权，在荣智健手上似乎又重新回来了。

但问题在于，荣氏家族一手政治，一手财富的发展模式，虽然将中国传统的官商合作模式发挥到了极致，但却无力改变官商合作链条中官的主导地位，而所谓的商人，在这样的链条里，一直都是政府的附庸。荣毅仁的一生基本保全了自己的个人幸福，但却没有在产权意义上为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的进一步提升提供更好的范式，他只是在重复无数企业家走过的官商合作之路。在这条狭窄的路上，荣毅仁是为数极少的成功者之一，但更多的商人却跌倒在路上，成为中国商业史上不忍卒读的声声叹息。

让荣毅仁先生无法想到的是，这一声声的叹息中，竟然出现了他的儿子荣智健的影子。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xy1978@hotmail.com）

周末，看意甲比赛，所有的球员都戴着黑纱，比赛前默哀一分钟，悼念意大利的地震死难者；周中，看欧洲冠军杯 1/4 决赛，球员也带着黑纱，悼念整整 20 年前的英国希尔斯堡体育场惨案，当时有 96 名球迷在拥挤中丧生。人民网“历史上的今天”栏目罗列了 4 月 15 日的诞生和死亡：1998 年 4 月 15 日，红色高棉前领导人波尔布特病逝；1980 年 4 月 15 日，法国著名作家让-保罗·萨特去世；1912 年 4 月 15 日，泰坦尼克号与冰山相撞后沉没，1595 人丧生；1912 年 4 月 15 日，金日成诞辰；1865 年 4 月 15 日，林肯遇刺逝世；1452 年 4 月 15 日，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诞生。我想再加上一行：1989 年 4 月 19 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我找出他的女儿满妹撰写的《思念依然无尽》（北京出版社，2005 年），翻看上次阅读留下的痕迹，有很多地方值得重读。其中一个细节是，中共中央在悼词中称胡耀邦同志“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胡耀邦的夫人代表全家提出：不要这样写，那时胡耀邦的处境没有机会，也不可能针锋相对进行斗争，有抵制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张黎群等撰写的《胡耀邦传（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5 年）已经出版多年，可惜第二、三卷一直未能公开出版。即使第一卷，也是不完整的。2009 年第 4 期《炎黄春秋》刊出了当时删去的李锐序言《向胡耀邦学习》，文章提到：1979 年 3 月 25 日，西单民主墙出现《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中国人权宣言》等大字报，随后作者被捕，胡耀邦极不以为然，给一位青年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人民日报》4 月 10 日头版发表，信中说：“教育青年的方法，不是压，不是抓，应该是‘引导’两个字。‘引导’比‘教育’更精确，意义更大。这是我们几十年工作的经验总结。压制的方法，一个巴掌打下去，是封建家长的办法。”随后 6 月间，他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发言中，更加严正地对取缔民主墙和逮捕人发表了意见：“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牢。”胡耀邦当时还主张成立一个民主公园。后来，北京市虽然将月坛公园定为民主公园，由于政治形势影响，无疾而终。当年党内老人支持胡耀邦的只有叶剑英，叶剑英说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根据惯例，北京设置了专门供游行示威人员表达自己意愿的地点。新华社报道，总共有 77 起申请，其中境内人员 74 起，境外人员 3 起，最终 74 起游行示威活动的申请人自行撤回了申请，2 起申请手续不全、不符合申请要求，还有 1 起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规定的不予许可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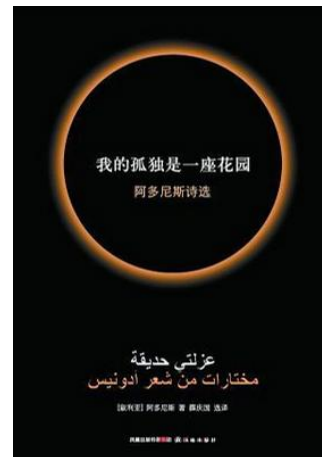
抄录这些公开发表的文字，恍如隔世。同样恍如隔世的是红色高棉，1975 年他们推翻朗诺政府，开始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实验，总人口只有 700 万的柬埔寨在三年八个月零二十天的时间里非正常死亡了 100 万到 200 万。虽然灵魂人物波尔布特已经死去，他的五位同志没有逃脱接受审判的命运，2009 年 2 月柬埔寨特别法庭正式开庭。2009 年第 4 期《国家历史》的“审判红色高棉”专题，让我关注的不仅是正义如何得到伸张，还有《一个前红棉干部的幸福生活》。这个红棉干部来自一个革命家庭，兄弟姐妹 11 个全部投身革命洪流，谈到波尔布特的去世，他有着“说不出的悲痛的感觉”，感慨这是一个“好的领导人”，他认为红色高棉的屠杀，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杀害人民之后的嫁祸。他现在过上幸福的生活，既是公务员，又是一所私立学校的股东，经常教育孩子：“如果没有波尔布特，也没有你们的今天。”看到这篇文章，我很好奇，不知道柬埔寨有没有“乌有之乡”网站。这位前红棉干部将屠杀归咎于别有用心的人，归咎于前红棉的基层干部，这显然是一种自我赦免，即使如此，他也没有直接对屠杀做出高度评价，没有说屠杀有利于稳定，没有说屠杀有利于优胜劣汰，更没有否认屠杀的存在，看来他的革命意志还不够坚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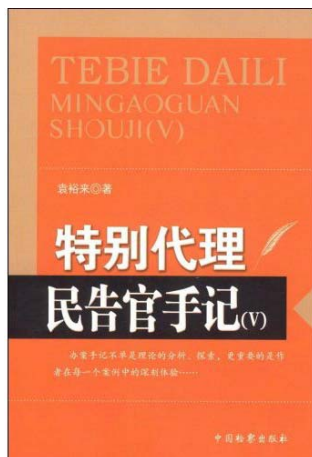
极权主义留给人类很多难题，其中一个就是如何对待那些参与屠杀工程的螺丝钉：如果人人过关，那又变成了一轮新的清洗；如果人人蒙混过关，天理和公理何在？或许小兄弟可以把责任推给老大哥，但老大哥不能把责任推给小兄弟。2009 年 3 月，国际刑事法院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对苏丹总统巴希尔发出逮捕令，巴希尔被指控在苏丹达尔富尔西部地区展开“屠杀比赛”，杀死了 35000 人，并导致超过 10 万人在饥荒和流行病中死亡。虽然国际刑事法院不可能到苏丹把巴希尔抓捕归案，但是逮捕令依然有着示范作用，恶有时无法被制止，这不意味着不应对恶做出判断。美国学者安玛丽·斯劳特在《这才是美国：如何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坚守我们的价值》（马占斌等译，新星出版社，2009 年 1 月）里讲到美国如何对待非民主国家，她表示美国首先要承认自身民主制的不完美，与非民主国家不是要么往来、要么隔绝，应该是“接触，但是详审”。这本书梳理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宽容、谦逊、信仰等价值观，中国一些人士习惯于把这些价值归为美国价值，进而加以反对，这种把“排外”或者“反美”当做“爱国”的思维，恰恰是对中国的最大否定，等于把自由、民主等价值排除在中国价值之外。许倬云先生的《历史大脉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 2 月）试图梳理中国价值和世界价值互相交错的脉络，这是一部把中国纳入世界的历史，这与那些把世界纳入中国的天朝历史完全不同。在有限的篇幅里，许倬云同时呈现一部中国简史和一部世界简史，这对于非历史专业的读者来说尤其具有参考价值。

如果需要更为详细的内容，可以与他的《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年）并肩阅读。

我不太喜欢读史诗，却相信史和诗有相通之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在诗中虚构或者纪录了 T 城、Z 城、G 城，“在 T 城，连玫瑰都成了牢笼，/面包都是警察”，“Z 城的居民只为一场斗争而献身：吞噬自己兄弟的肉”，“在 G 城，你会拥有数不清的钥匙，却找不到一扇门”。将近 30 年前，中国诗人梁小斌说：“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梁小斌还说：“我看见了雪白的墙”。阿多尼斯呈现了新的困境，当你找到数不清的钥匙，却发现面前是一堵墙。“Z 城教导其居民毕生致力于一项工作：污染太阳的光芒。”相反的情况同样存在，即毕生致力于歌颂太阳的光芒，两者的结果殊途同归，“在 Z 城，人的死亡，是表明他曾经活着的唯一证据”。2009 年的春天，媒体难得地聚焦一位诗人，一位与“梨花体”无关的诗人。阿多尼斯的《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薛庆国选译，译林出版社，2009 年 3 月）是阿米亥的《开·闭·开》（黄福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年）之后，又一本让我反复阅读的诗集。虽然这本诗集的最初几首并不是那么有魅力，“我迷恋祖国的山歌/由牧童像清晨一般传唱”，有点像早年的舒婷，但是，阿多尼斯迅速地、坚决地告别了青春，在一年之后写道：“因为我在行走，/我的棺材赶上了我。”有些遗憾的是，这本诗集有很多是节选，我不太习惯阅读节选的诗歌，这就像依靠故事梗概阅读小说一样，捕风捉影。阿多尼斯访华之后，对记者表示对中国有点失望，记者问他失望在哪里，他表示保守秘密，大概他准备把秘密隐藏在诗歌里。



秘密不是秘闻，它不是隐藏在日常生活的深处，而是就在表面，正是如此，秘密更加难以被发现，就像爱伦坡的《失窃的信》，警察局长掘地三尺未能找到的信，就在一个触手可及的卡片架上。中国的秘密，几乎已经被中国的作家遗忘，一些电影导演和纪录片导演却在致力于寻找这种秘密。贾樟柯在电影手记《贾想 1996-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3 月）里讲到自己的一段经历，初三的时候，一个平时只关心兔子的结拜兄弟要当兵走，这种离开学校和父母管教的“自由”生活让贾樟柯很是羡慕，可是这个兄弟愁眉苦脸地说：球，兵役，劳役，还不都是个役！这句话让贾樟柯震动至今，他感慨“巨大的生活变化，让一个从来不善于思考的养兔少年去思考自由的真相”，这个少年对当兵问题的看法“超越了 1984 年文化层面的宽容程度，而直指问题的本质”。一个人是否走出青春期，与他是否发现日常生活的秘密有关，有的时候这要靠阅读来完成，有的时候则需要顿悟，无论阅读还是顿悟，都与思考有关。



这几年，我一直是个法律爱好者，购买了不少法律书籍，但主要是法律制度史和法学理论。袁裕来先生寄赠的五册《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2009 年），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虽然中国并非判例法制度，这些案例依然给人一些希望。作者在博客上列举了自己告过的从国家发改委到街道办事处等 245 个行政机关以及通过孔夫子网购买的 200 多本台湾法学著作，现在再读这些办案手记，更让人感到“庭上一分钟，庭下十本书”的功力。阅读这些案例，我经常不恰当地想起法律出版社的丹宁勋爵系列。在未来的日子里，更多的律师像袁裕来一样，对此我一点也不悲观；但是，是否会出现丹宁勋爵式的法官，我不太乐观。不过，我也不会绝望。台湾法律界资深人士谢启大在《台湾：期盼司法可以对政治说“不”》（2009 年第 3 期《同舟共进》）里讲到 1989 年的标志性事件“吴苏案”，这是台湾司法界首例由基层检察官主动侦办司法高官的案件，当时参与其事的法官、检察官有一个共同约定：“决不以参与这个案件得到的声名，作为资源去从政或谋取其他利益。”案件结束后，大多数人选择辞职离开，领衔的高新武检察官离职前对谢

启大说了一番很重要的话：“深受司法界不良习气影响的现职司法人员已经很难改变，但我们可以寄希望于未来的司法人，他们现在可能还在学校就读，或者刚进入司法系统，还没有被‘污染’，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树立一个典范，让他们知道一个好的法官应该怎么做。我们正在播撒种子，六七年后我们会看到第一批司法新苗出现，二三十年后就会逐渐成林。”六七年后，第一批向李登辉说“不”的司法官，领头者中就有“吴苏案”中的实习司法官；二三十年后，那些逐渐成林的法官将陈水扁拿下。看到谢启大笔下的这段历史，想起三毛的一首诗，那首著名的歌：

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

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

每个人心里一颗呀一颗种子

是我心里的一亩田

用它来种什么 用它来种什么

种桃 种李 种春风

开尽梨花春又来

那是我心里一亩一亩田

那是我心里一个不醒的梦

FILM 电影

观察员 言一（成都，richard7briner@gmail.com）

都说 2008 是日本电影丰收的一年，而这丰收亦并非仅是因为《入殓师》在奥斯卡的获奖。事实上，在日本《电影旬报》年度十佳的电影榜单中就有不少远胜《入殓师》的作品。某种程度而言，《入殓师》的获奖，不过是成功地把握住了一种商业与艺术间的平衡。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的论断无意抹杀《入殓师》的全部，而只是想指出目前电影评奖的一种现状。因为我实在很难想象节奏如同《步履不停》一般缓慢的影片可以赢得奥斯卡的青睐。

单就《入殓师》而言，其纯熟的叙事技巧和出色的镜头运用都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里面演员的表演基本上抛弃了日本电影中常见的夸张，显得颇为内敛，自然。同时，影片也没有就生死这一问题做过多的探讨，而把重点放在对入殓师这一特殊行业的刻画上，借由对死者的敬意成功地为这一行业渲染上一层近乎神圣的光晕。从而，作为一部表现某种传统的类型片而言，《入殓师》可算得上一部优秀的作品。而同样视角或类型的影片在国内却依然稀少。



同样不容置疑的，是久石让的配乐。不少观影者便是直接被片中的音乐所击中。然而，我却不得不说影片中在旷野中拉琴的镜头显得有些过于刻意了，远不如之前在房屋里的演奏来得自然。及至影片最后，导演则没有经受住诱惑，让男主人公记起了幼年时父亲的面容。这样一种回忆的恢复，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一次成功的治愈；但展现在电影当中，却是某种美学层面的不节制。镜头语言和情感表达上的不节制，大约算得上我对这部获奖片最主要的不满。

如果说《入殓师》中演员的表演已比较接近自然，那么《步履不停》中演员的表演则可



称得上一种纯生活化的表演；而整部影片也更像是对生活最为直接，不加修饰的展现。只是在片中这样的生活，严格意义上依然是关乎死亡的。但不同之处在于《步履不停》的重点并不在死亡本身，而在于死亡——这样一个意外的死亡对整个家庭的影响，在于它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一步步改变了家庭每个成员的生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化的表演其实是必须的。只有这样，才能从日常生活里无数琐碎的细节中折射出前面提及的影响与变化。

说起来，不知是巧合还是真的是一种趋势。在年内所接触到的日本作品中，包括电影，日剧，小说，动漫，似乎都有一种不约而同的转向——似乎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转向了对于人的日常心理状态的关注。以日剧《三角迷踪》为例，尽管故事的起因是一宗谋杀案，但无论是日剧还是原小说都把重点放在了对被凶案牵涉其中的诸多人物的刻画。再以东野的小说《嫌疑人 x 的献身》为例，一开始凶手是谁就已经不再是疑问，小说的华彩径直落于两位天才之间的高智商对决与惺惺相惜。在我看来，这样一种以“心理”为核心的转向是颇具人文关怀的，如果这一趋势真的存在的话。

回到《步履不停》这部导演因双亲亡故而引起拍摄的电影，其缓慢却不散乱的节奏与静谧的色调是我深爱它的理由。影片以厨房里准备料理的细节开始，及至影片一半也都还是大量类似的生活细节。观者能从中获得的信息极为有限，仿佛只是城里工作的儿子携家人在周末回乡下与父母团聚。直到年轻后生的出现，尽管场面依然平静，但却能感觉得到人心间已起波澜。随后，家庭中的一些小秘密渐次出现，而导演在前半部分所埋下的伏笔亦逐一显现。所谓对于叙事节奏的优异控制，莫过于此。而影片的结尾，则可谓点睛之笔。“总是慢一拍”的隐喻耐人寻味，令人感慨，对导演之前在片中精心安排的种种细节也方才若有所思。及至最后，很可能禁不住想要再看一遍，细细体味那人生中缓缓行来却从未休止的一步，一步，再一步。

比之《步履不停》的静谧，桥口的《周围的事》要显得喧闹一些。这是因为，作为影片叙事辅助线条的正是发生在不同时间的庭审案件。可是就情节主线或是影片内核而言，桥口的《周围的事》与是枝的《步履不停》其实颇为一致——都是指向了那些看似平淡无奇却又偏偏在生活中缠绕你我的“周围的事”，同时也都指向了我们的人生之路。

桥口将故事的主线放在一对年轻夫妻身上，以时间为轴，刻画了他们从 1993-2001 年的生活历程。不同时期夫妻间的悲喜与不同时期庭审中众生万象互为点缀，不经意间便勾勒出了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碎之后的社会生活乃至现实危机。夫妻二人的路要如何走，与日本该如何前行实则构成了一组平行的线条。既相互作用，又互为隐喻。只是这样的问题往往没有答案，就仿佛人生之路其实看不清前面的路途，只能偶尔回望来路，然后一步步地走下去。值得一提的是，在《周围的事》当中，桥口把夫妻间的一些荤笑话和裸露镜头处理地十分自然有趣，但如果要在内地公映的话恐怕还是逃不过广电总局的那把大剪刀。

在旬报十佳之外，北野武的新片《阿基里斯与龟》也颇得我心。比起同样是反思自我的上一部《导演万岁》，《阿基里斯与龟》在构架上显得更为完整，不那么支离破碎让人摸不着头脑。而由于情节关乎绘画，也显得更加色彩斑斓，在令人赏心悦目的同时，亦充满隐喻。表面上影片是在以男主人公对流行画风亦是社会认同的近乎偏执地追赶来类比阿基里斯对于龟的追赶，但在另一层面上，未尝不是北野武对自身的一种自嘲与暗喻：拍摄不同风格的电影作品是否也是为了赢得观众或者评论人的认同呢？

在影片中，由于画界时尚风格的不断变化。男主人公几乎尝试了所有了绘画风格，而以我在美术史方面的阅读来看，这些模仿的画作全都像模像样，令我不由在心里感叹：如果一个人能如此纯熟地掌握这样多的画风，那么就算他没有太多的独创性，却也离大师不远了。而据说片中的画作竟全是由北野武本人创作的。尽管在之前的影片中，他便已经展露了自己在绘画方面的才能，但是经由这样一次大规模的展现，他对于色彩的把握能力令我佩服的五体投地。至此，北野武的质疑也达致了顶峰：片中那些未获认可的美丽画作是否算是艺术；主人公真知寿又是否算是画家？像这部动人但未必获奖的《阿基里斯与龟》是否算是佳片；而我北野武又是否算是优秀的导演？

从《双面北野武》到《阿基里斯与龟》，北野武的导演三部曲也算是划上了句话。于是，我不由得好奇，下一部电影，北野武会怎样拍呢？是继续反思反讽，还是来点别的什么。北野武的心思，从来都不是好猜的。

四月，已然洋溢着初夏的味道；而夏天又往往和青春一起飞扬。日式的青春片，如同台式的青春片仿佛怎样拍都拍不完。只是台式的青春往往青涩内秀，日式的青春却要么残酷要么张扬并且掺杂着猥琐与夸张的搞笑。《我们与条子的 700 日战争》便是属于后一种。然而该片令人心动的地方却恰恰在于其搞笑和捉弄方式的拙劣。因为影片的时间被设定在 1979



年的日本乡间。那时没有电子游戏，没有网络。于是青春只能在田间地头以一种最为简单但不失有趣的方式在宣泄。正是片中的单纯与美好，让我主观忽视掉其中的夸张与拙劣，在放声大笑的同时，却忍不住暗想：再过 50 年，我们还能拍出这样的青春片么？

MUSIC 音乐

观察员 成庆（波士顿，veron.cq@gmail.com）

观察波士顿的音乐生态，其实颇让人感到不易。尽管前前后后参加 40 余场音乐会，但是每次都会发现一些新的关注点，这种新鲜感之所以没有断绝，其原因或许是波士顿吸引了全世界一流的音乐家，走马灯似的轮流上场。这样你就能以管窥豹，感触到这个时代古典乐的一些基本风格与精神所在。

但是波士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展示平台，他有自己的音乐趣味，有自己的主流审美价值。前来演出的音乐团体风格，大体上都十分保守怀旧。尽管像列文一直试图加大演奏现代曲目的力度，但是就连 BSO 这样的团体，也没办法在演奏梅西安的时候保证到一半以上的上座率，你就大体可以猜测到波士顿的听众对于现代音乐的态度。

如果说音乐的现代性是以 JAZZ、New age 以及轻音乐的流行作为代表，在波士顿就会发现，这座城市的音乐趣味相当反现代。就以古乐(Period performance)为例，此地的 BEMF(波士顿古乐节)几乎场场都能满座，这当然一方面要归功于前来演出的音乐家都是古乐界的翘楚，如像 Jordi Savall 这样的古大提琴天王级人物，几乎每年必来演出；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无疑也反映了这座城市的精英文化阶层的结构。你可以不喜欢，但是假如你要融入波士顿，你必须接受这种强势的精英文化趣味。

按照勋伯格的说法，像阿尔班·贝格、斯特拉文斯基这些现代派作曲家，虽然已经不再以“美”作为音乐的目标，而是将“恐惧”、“愤怒”、“挣扎”这些现代情感作为表达人之处境的主题。但无论如何，这类音乐仍然是以真理的哲学性思考作为目标的，而 JAZZ、轻音乐这类音乐形式，却是奠基在一个大众文化生产的现代基础之上，正是大众文化的生产机制，成为消解精英文化的最有力的武器。

由此看来，波士顿能有这般保守、精英甚至有点倨傲的趣味，无疑让人感到奇怪，他为何能抵挡住大众娱乐工业的压力，据守住精英文化的领地，保存着托克维尔当年来此感受到的欧洲遗风，都是让人觉得值得深究的话题。初初想来，波士顿人对欧洲文化传统的自觉维持以及 19 世纪末开始的以文化教育作为主业的政策，或许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吧。



阿诺德·勋伯格

回到本月的演出，大体可以总结为“三喜一忧”。所谓忧者，是波兰著名钢琴家 Zimmerman 临时因病取消音乐会，让我无缘得闻，而之所以有此心结，则在于早年爱乐的我，深为他与伯恩斯坦合作的贝多芬钢琴协奏曲而感动，虽未发愿聆听其现场演出，但是如此良机错失，未免会埋怨造化弄人。

其它“三喜”则值得较为详细的报告。第一场是本年度古乐节的压轴大作——古乐演唱名团 Tallis Scholars。这个成立于 1973 年的团体由 Peter Phillips 一手开创，主要以演唱文艺复兴时期的复调歌曲为主，历经 30 余年，如今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复调作品得以成为常演

作品，不能不归功于他们的坚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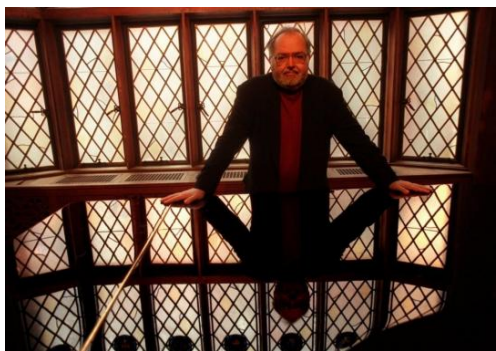
熟悉中世纪圣歌的乐迷应该对这个名字有所耳闻，他们曾在 1999 年访问北京，有过两场演出，不过关于这次访问，我没有查到任何的资料，因此也无从了解当时国人对他们的反映到底如何。

当晚的曲目相当令人期待，上半场就有 Palestrina 的 *Surge illuminare* 的片段、Peter Philips（这个 Peter 与本场指挥同名）的 *Ecce vicit leo* 与 *Ave Jesu Christe* 以及 Lassus 的安菲特利特弥撒（*Missa Bell'Amfitrit'altera*）等大作品。我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复调音乐，只不过是新手而已，所以个中滋味，实在无法细细评说。但是值得一说的是，今天大家比较熟悉的巴洛克音乐，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声复调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其中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复合唱（double choir）的出现。这种复合唱基本开启了后期巴洛克时期乐器协奏的先河，以人声的对比与高低起伏来表现各种音色的融合与结构。

就以 Palestrina 的 *Surge illuminare* 为例，SATB(女高音、女中音、男高音、男低音)四个声部要么以男声作为音色铺垫，女声在高音部游走流动，然后逐渐下降，转由男声开始凸显，女声则开始环绕游离。如果细细聆听，你可以明确感受到音色的流动性与细腻的肌理。尤其是最后的“et gloria eius”的前后往复，最后汇聚成对位的和声，让人印象深刻。

本月，Good Friday 与复活节相继来临，Emmanuel Music 也在此时推出了巴赫的大部头作品《马太受难曲》。

巴赫的《马太受难曲》以马太福音里的耶稣受难作为主题，而歌词除了圣经文本之外，咏叹调与独唱歌手的二重唱部



Craig Smith: Emanuel Music 创始人

分，都是采用的是彼康德（Picander）诗歌作为歌词。而这部作品的另外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乐团规模与长达三个小时的演出时间，不仅采用了两个混声合唱团和一个管弦乐团，而且还在部分片段处配有儿童合唱团，而 Emanuel Music 基本按照这些要求来配置当晚的演出规模，颇让我十分震撼。

聆听这样的大部头，聆听前自然有必要对这部清唱剧的主题有所了解，这样你才不会迷失在里面各个角色（耶稣、传教士、犹太、圣彼得）的庞杂情节之中。而里面大量的宣叙调与咏叹调所构成的繁杂结构，也需要你能高度集中注意力，当晚的演出专门印制了精美的歌词本，十分贴心，于我而言，更是一份有价值的纪念品。

我聆听这部受难曲虽断断续续多次，版本也收集了不少，但是对全剧的结构与巴赫在音乐形式的独具匠心，仍然没有办法十分清楚的理解。尽管如此，这部受难曲的强烈戏剧性的展开，仍然会让我时常深为感动。就以第一部分为例，每一段其实都构成了一个场景与主题，比如波大尼的女人这段所凸显的“预言”主题在巴赫那里有非常让人感动的表达。波大尼女人所唱的“悔恨与哀伤”这段女低音咏叹调表达的是马利亚给耶稣献膏后（预言耶稣将会死亡）的哀伤，让人心肠有如寸断。

而我个人最偏爱的一段女高音咏叹调，发生在犹太准备以 30 块银币出卖耶稣时，彼康德以非常强烈的情感来表述这种出卖，“啊，血流吧，爱你的心，哎，您亲手抚育的孩童，吮吸你乳头的人，却要谋害养育者，变成一条毒蛇，哎，这个孩童，血流吧。”这段咏叹调的哀伤悱恻，就算常人也无法不为之动容。

值得一提的是，Emmanuel Music 作为对巴赫作品情有独钟的音乐团体，一直致力于巴赫作品，不仅会在每周日礼拜时演出一首康塔塔，而且还在今年上演了巴赫的全部六首大提琴无伴奏。在波士顿，时常可以发现这样执着于某一类作品的演出团体，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谨守着传统。

最后要报告的是波士顿室内音乐协会的一场演出，开场由 BCMS 的主席 Ronald Thomas 上台致辞，这将是他的最后一场演出，当然，这也是我第一次听他的现场演奏，第一次与最后一次，就这么奇妙的遭遇了。

Ronald Thomas 是美国本土大提琴家，虽然只活跃在一些室内乐领域，但是其师承却很名门，他是 SOYER 的学生，算是 Casals 的徒孙辈了。今天曲目上下半场，分别是舒曼的 *Fairy tales* op.132，贝多芬的大提琴奏鸣曲 A Major op.69，下半场则是勃拉姆斯的钢琴三重奏 C Major。舒曼的作品作为暖场，本无多说之语，但是接下来，Thomas 的演奏让我无疑受到震撼，贝多芬的大奏我听过不少名家版本，从 Casals、Fournier、Bylsma、Du Pre 到 Harrell 等等，不算陌生，但是 Thomas 一起弓，便让我莫名感动，眼泪几欲夺眶，听过这部作品的大



Ronald Thomas

概可知，这首 A Major 的旋律线优美，但却未落入后来浪漫主义的旋律中心窠臼，贝多芬的美妙在于，他对旋律与表达内容之间有非常切合的把控，就以这首 A Major 来说，写作年代大概在贝多芬近 40 岁时，也常被公认为他写作的最美妙的大提琴作品，按照他的作曲思路，大提琴与钢琴必须保持平衡，因此在听贝多芬的大奏时，非常强烈的一种感受就是对话的平衡感，这样就形成一种强烈的对话关系，在这种关系的展开中，演奏者各自的特质也表达无疑。

Thomas 将开篇的这段旋律拉的直入人心，前排的两位年轻人还对视一笑，似有惊艳之意。随之钢琴伴奏应答，大提琴声逐渐地深沉，隐入后台，这首曲子的美妙之处就在于这种彼此的相继显现与淡出，直到高潮处的互诉，来撑起一个完整的起承转合结构。从 Thomas 的演奏风格来说，个人感觉速度中等，Fournier, Caslas 的第一乐章较快时常 9 分多钟，但像 Piatigorsky 就慢到 11 分钟，而像 Harrel 就更是到 13 分多钟，Thomas 昨晚的节奏掌控的相当好，抒情段落与快速乐句的过渡让人不会觉得任何突兀，反而形成自然的快慢转化对比，这也赖于和他搭配的韩国钢琴家 Mihae Lee 的表现，但是凭当时我的感觉而言，Thomas 似乎仍然占据了主导，而不像我听 Fournier 与 Kempff 的搭配，以及 Dupre 与 Barenboim 的搭配那样势均力敌。

多年前记得初听杜普蕾，是手舞足蹈的听完这支曲子，直到后来发现了 Fournier，才知道这首曲子的美妙旋律感背后，隐藏着极深层的人生悲剧意识，激情的发展是颓败，柔情的结局是寂静，我们就是在颓败处发现柔情，在寂静时去发现激情，如此周而复始，人性的完整意识由此发展出来。除开贝多芬晚期的作品之外，我们可以看到 贝多芬在这种转化过程中所展现的人性最丰富的一面，他深知高潮处的结局，也深知柔情处隐藏的危机，他表达它们，曾经认为这就是人性，但是到晚年，他似乎却改变了看法，他似乎认为，任何形式的美好都无助于表现人性最复杂的一面，到最后，似乎只有一种超越形式的表达，才能表达出内心最为隐晦与曲折的部分，正是在这里，艺术以一种返璞归真的方式呈现，我们了解，我们表达，仅此而已。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JAPAN 日本

新闻界与政治

特约撰稿人 刘 柠(北京, postdadaist@gmail.com)

一个社会中大众传媒的发达程度与其影响力成正比，这是一个无需诠释的常识。新闻记者在西方被称为“无冕之王”，在三权分立的权力构造中代表所谓“第四种权力”，其实说的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网络技术高度普及，全球报业急剧萎缩的今天，其实真正担得起如此评价的国家并不多。而就一个负责任的新闻界对国家政治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言，非美国和日本莫属。前者，“水门事件”中，当时规模并不很大的《华盛顿邮报》两名青年记者（卡尔·伯恩斯坦和鲍勃·伍德沃德）在报纸女掌门人格雷厄姆的支持下，叫板白宫，硬是凭手中的笔把总统尼克松拉下马；后者，1974 年，另一名青年政治记者立花隆（Takashi Tachibana）在《文艺春秋》上发表长篇调查《田中角荣研究——其金脉与人脉》，撕开了日本黑金政治之网的一角，成为田中下台的直接动因。

在日本现当代史上，就作为新闻记者、报人的资历和影响而言，堪与著名政治记者、《读卖新闻》老板兼总主笔渡边恒雄（Tsuneo Watanabe）相匹敌者鲜，恐怕只有战前《朝日新闻》社长兼主笔绪方竹虎和曾担任过《东洋经济新报》社长的石桥湛三，但后两位均在战后跻身政界，成为政治家。而只有渡边恒雄以普通“番记者¹”入行，从驻美特派员而政治部长，从编辑局长到执掌社论的编辑委员、总主笔，从而成为报纸发行量冠全球之首（1400 万份），旗下拥有电视台、出版社、职业棒球队及众多广告媒体的传媒王国读卖集团的社长，可谓媒体人的“最高境界”。但光环笼罩之下，渡边本人最看重的却是总主笔的名头，被称为“一代政治记者”、“终身主笔”。

渡边恒雄是日本尚健在的前辈新闻工作者中，为数极少的经历过战争的人。1945 年 6 月底，入东京大学文学部，一

¹ 日本新闻界独有的现象，指长期专门跟随政界某个特定人物，随时采访以获取即时的一手消息的新闻记者。

周后即被征召入伍，属于“学徒出阵”的一代。出发时，渡边偷偷往行囊中塞了三本书，分别是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威廉·布莱克诗集》和研究社版《袖珍英语词典》。渡边幼年丧父，人生态度比较虚无，是哲学青年，他觉得“反正要到战场上送命，真能扛得住的只有哲学”，于是囫圇吞枣读了很多康德、尼采，还有日本的西田哲学²，但后者“没什么用”。跟他差不多同时接到征召令的一名东大法文科的友人，正吃着饭团，听渡边说了句“战场上也是有诗的”，愣了一下，饭团就掉到地上。原来，他把“诗”理解成了“死”（日语中，“诗”与“死”同音）。这对渡边来说似乎是一个隐喻，“原来应征入伍是与死相连的。”不过，幸运的是，日本旋即投降，渡边也免于在海外战场上当炮灰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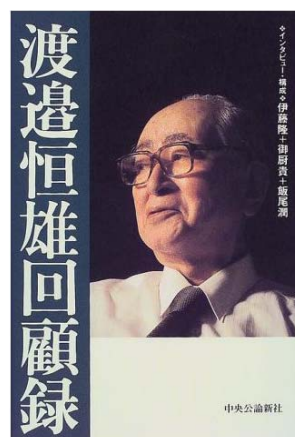
随后，复学东大；出于对战争和天皇制的痛恨，加入日共，后又被除名。渡边作为政治记者最初的修炼，是跟随自民党政治家大野伴睦³的番记者，深蒙后者信任。对渡边而言，大野是父兄般的存在。正因了大野，这位自民党早期资深政治家，田中派之前最富实力的派系大野派领袖的青睐，渡边才得以近距离深度观察日本的政治生态，尤其对执政党内派系斗争的游戏规则和潮流颇有心得。

日本新闻界实行记者俱乐部制度，各大媒体派到总理府、政府各大机构（省厅）和相关政治家身边工作的记者有配额限制，但由于媒体发达，规模庞大，在一些大牌政治家身边工作的番记者经常有一群人。政治家出于自己的政治倾向和好恶，不可能对所有的媒体和记者“一碗水端平”，有限的信息资源往往优先、定向流入部分媒体。这在日本是人之情，记者同行之间也彼此见怪不怪。晚间，大野家的客厅里动辄有十数名番记者，盘坐在榻榻米上，一边有一搭无一搭地聊天，一边等消息。大野其人性喜风流狠谈，段子一个接一个，包袱连甩不断，兴致好时，动辄侃上一个时辰。记者们很怕这个，再生动的段子，听过十遍，也腻了，于是拍屁股走人。渡边也起身佯装告辞，跟最后一拨记者一起作鸟兽散之后，再独自悄然折返。绕过正门，翻墙而入，径直走到女仆跟前：“请把老头子叫来”。于是，俩人切入正题。

喜欢段子的政治家不止大野，有名的是前首相岸信介。如果说，大野的段子是某种旨在抖包袱的诙谐狠谈的话，岸的段子才是真正的浑段子，即兴、直接而生猛。对这种应酬，渡边乐此不疲，接招还招，起承转合，每每扮演捧哏角色。为此，屡遭记者团抗议：“渡边，够了。每次都因为你和岸先生的二人转，害得大家采访交不了差。”

作为跟随大野的番记者，渡边婚后选择在离大野宅邸咫尺之遥的地方赁屋而居，白天到大野府上报到，晚上陪酒成了日课。作为政治记者，渡边影响力日增，不仅深度介入派阀政治，有些派内重大决策，干脆由渡边代为向记者团其他媒体同行们发表，事实上扮演了派阀大佬军师的角色。前首相池田勇人的秘书伊藤昌哉在其著作《渡边恒雄：媒体与权力》中说：“大野是如何决策政治行动的呢？只需对其意志决定路径加以梳理便会发现，在最后的环节都会触到渡边。渡边不仅作为大野的耳、目收集信息，而且发挥了作为脑，即指挥塔的作用。”这在后来成为首相的中曾根康弘的入阁问题上，表现尤为充分。

在日本政界，青年政治家成功的龙门是入阁，尽可能多地出任各种重要阁僚或党内要职，积累经验和人脉、金脉，为自己做大，最终通向王者之路作铺垫。作为政坛青年才俊，中曾根虽然 29 岁就当选国会议员，但由于系党内少数派河野派成员，入阁之路迢迢。于是，渡边在一家高级料亭设局，安排身为党的副总裁、同时兼河野派组阁窗口的大野与中曾根见面。谁知两人一见，大野劈头就指中曾根骂道：“就是你小子在造船疑狱事件⁴时的预算委员会上说‘大野伴睦接受了贿赂，我敢拿政治生命打赌’的话吧？那时的一剑之仇，老子可还没忘呢！”渡边见势不妙，出来打圆场说：“副总裁好一个直性子。但对过去的事情，不磨磨唧唧纠缠不休是谁说的来着？造船疑狱事件那会儿，中曾根还在在野党改进党那边。记恨人家在野党时代的发言，这会儿旧话重提，不太像副总裁吧？”一番话，使僵硬的空气顿时缓和。大野说：“嗯，也是，知道了。不过，中曾根君，你是有总裁相。”渡边顺水推舟道：“中曾根因系河野派，远离入阁窗口，无法施展。身为副总



² 西田几多郎 (Kitaro Nishida, 1870-1945)，日本现代哲学家，京都大学教授，京都学派创始人。

³ 大野伴睦 (Banboku Ohno, 1890-1964)，岐阜县山山市出生，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肄业。自民党实力派政治家，历任北海道开发厅长官、众议院议长、自民党副总裁等。

⁴ 围绕旨在降低造船事业中的贷款利率的《外航船建造利息补给法》的制定请愿问题而发生的收受贿赂案件。1954 年 1 月，东京地方检察院以强制调查司法介入，政财两届多名要人被卷入，也成为吉田茂内阁被倒阁的动因之一，是战后政治的污点。后著名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 (Seichou Matsumoto) 以事件为背景出版了一部小说《日本的黑雾》。

裁，您有河野派的推荐权，无论如何请协助推进中曾根的入阁事宜。”一句话，1959 年 6 月，中曾根成了河野派中唯一入阁的成员，出任岸信介第二任改造内阁的科学技术厅长官，时年 41 岁。而大野那句“总裁相”云云的话，让渡边大吃一惊。中曾根后来在政坛的发迹，也反证了大野识人的眼力。

中曾根入阁后，有一天叫渡边去他办公室，拿出一叠厚厚的文件——关于造船疑狱事件的检方调查报告：“我的高中同学是此案的担当检察官，偷偷把材料给了时为在野党的我。”渡边随手翻了翻，里面有张手绘的草图：在某间料亭的单间，大野伴睦坐在什么位置，与事件有关的其他人坐在什么位置，艺伎坐在什么位置，一清二楚。中曾根根据检方的调查结果，在把金钱授受关系摸了个底掉之后，才在国会上对大野出手。对少年气盛的中曾根来说，当着代表新闻界的渡边的面，痛遭一通狗血淋头，可为入阁却不得不低下四地给人家赔不是，无异于胯下之辱。所以，特向渡边陈请：“彼时的攻击完全是本着事实。这点务必请渡边你了解。”

此事堪称渡边与政坛后起之秀中曾根互为盟友、“蜜月”绵绵的契机。同时，也使渡边更清楚地认识到，“意识形态及外交战略等政策性考量，其实并不是绝对的。人在厕身权力斗争时，诸如憎恶、嫉妒及自卑感等情感性因素，往往会起更大的作用。”

另一位渡边过从甚密的政治家是田中角荣。作为政治记者，出于职业性的敏锐嗅觉，渡边对田中曾抱有莫大的期待。战后，从吉田茂开始，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等历任首相无一不是官僚起家，其政权也有很强的官僚政权色彩，令人窒息。只有田中，这个没有大学文凭、靠建筑业致富、38 岁即成功入阁的“黑马”，可能成就一番“党人政治”的大业，以涤荡官僚政治的保守和暮气。彼时，渡边刚结束在华盛顿支局四年的特派员生涯，回到国内，便马上投入到“角福战争”（媒体对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之间党总裁和首相宝座争夺战的称呼）的相关报道活动中。

从性格取向和对政治实力的判断上，渡边无疑是田中的拥趸：“角先生（媒体人对田中角荣的昵称）什么都跟你说，非常坦诚，是情报之泉。而且他讲话非常有趣。他要是东大法学部毕业的话，绝对当不了总理大臣，充其量也就是哪个省厅的次官，或者开发银行的总裁之类的。”

1965 年，田中任自民党干事长，离总裁的宝座还有一步之遥。包括渡边在内，一些大报的政治记者每天晚上都往田中家跑。田中重乡情，重义气，每天接见的几十号人中一半以上来自家乡新潟。这在东京出生、毕业于东大的媒体精英渡边看来，纯属瞎耽误工夫。终于有一天忍无可忍，对田中说：“大体上，角先生已经是干事长，下一步是要成为总理总裁的人，每天宁愿见几十口子乡巴佬，却不见我们新闻记者，这算什么事？”东北汉子田中一下子就火了：“乡巴佬是什么话？渡边，你给我收回！”渡边自知理亏，但也在气头上，表示无法收回。田中更搓火了：“你干涉内政！老子想见谁，想干嘛，全凭我愿意。你小子每次过来，我不也半个钟点、一个钟点地跟你聊吗？何时怠慢过你不成？”田中说的确是事实，经常边吃早餐边跟渡边谈话。但在这种尴尬的氛围中，渡边自忖也不能掉大牌，便嘴硬说不是在拿自己说事，而是“在说所有新闻记者的事”，说完悻悻离去。后来，渡边听田中秘书早坂茂三说：“角先生说，真想揍渡边那小子一顿。”但田中不记仇，事过去就算完了。

田中角荣如果不是战后日本金权政治始作俑者的话，至少也是集大成者。靠政治献金的推动，广罗党羽，使田中派成为党内最大的派系，历久不衰。不仅如此，政治与建设业者的利益粘连孕育了“建设族”、“道路族”等利权结构，历来是日本黑金政治的渊藪。不久前，因卷入西松建设非法政治献金案而备受舆论指责的日民主党党魁小泽一郎，就曾经是昔日田中门下的弟子。对此，长年在政治漩涡中呼吸、深谙派阀政治游戏规则渡边自然再清楚不过：“当了政治家，从大佬那儿拿钱。拿了钱，等自己也具备敛财能力之后，再分给下面的小的们。在当时的政界，这是铁则。虽然是导致政治腐败的原因，但不这么干的人绝对成不了老大。随着《政治资金规正法》的强化，报纸也拼命抨击金权政治，最近情况似乎没那么严重了，固然是好事，但我不认为这种陈规已完全绝迹。”

但纵然如此，对同行立花隆以那种极端的形式在《文艺春秋》上曝光，渡边本人持保留态度。这里既有立法方面的问题（原有的《政治资金规正法》在 1975 年修正前，对于政治活动捐助的法律规制极其宽泛），也有合法性资金被舆论曝光后的社会效果方面的问题：“如果不是具有违法性的、会成为刑事案件的聚财方法的话，报纸和电视本不应曝光”。

对田中大佬其人超乎常人认知与想象的敛财、散财方式，渡边在回忆录中多有披露，有些是从未公开过的材料：据《朝日新闻》记者三浦甲子二透露，原 NHK 节目主持人、参院议员宫田辉怀里抱着个大纸袋从田中家出来，与正要进门的三浦在玄关撞了个正着。宫田吓一跳，纸袋掉地上，一捆捆的纸币散落出来，“大约有 3000 万日元左右。”宫田慌了神，也不顾打招呼，低头拾起钞票，装进纸袋，夺门而逃。与渡边一样同为见多识广的大报政治记者的三浦，也不禁在心里感叹

道：“到底是角先生，玩的活就是大，跟我们通常听到的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啊。”

《日本经济新闻》记者在田中的连载专栏（《我的履历书》）结束，结集成书后，去府上拜会，因为田中表示个人要购买出版的相当册数。“角先生打开大保险柜，啪啪几下就拿出 200 万日元。当然全都是正当的购书款。”当记者要开收据时，角先生说：“那玩意不必。”记者偷偷瞄了一眼保险柜，“里面密密麻麻码放着成捆的钞票，堆得跟报社的稿纸似的。”因法律规制等方面的原因，日本政治资金有一个特点：现钞主义。不是现钞，全无效果。“拿的是现钞，递的也是现钞，所以踪迹全无。”

1976 年，随着洛克希德事件⁵被媒体曝光，已于两年前“退阵”的田中因受贿和违反外汇管理法嫌疑被捕。这是战后由吉田（茂）、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田中（角荣）一路开创的、被称为“保守本流”的保守政治的最大危机。本来此前围绕“保守本流”的是非存废，政坛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势力，始终在较劲。但此时，两种力量突然联手，矛头一致对准拿洛克希德事件开刀的首相三木武夫，旨在“倒三木”的“举党体制”迅速形成，连此前最大的反田中派福田赳夫也加入其中。

至此，现代日本的政治机器开始在与道德不同的坐标下运转，田中被捕后，其评价反而上升，舆论和政界的同情明显向田中倾斜。从当时的主流民意来看，逮捕前首相的做法，无论如何有些“过了”。这里，日本社会心理中保守性的一面再次浮水：国民的潜意识（或集体无意识）有时可超越道德律法，更看重现实的游戏规则。

田中果然“有种”，在拘留所里无论检方百般质询，誓死不吐一字。一个月后，被保释。最后，在有罪终审判决之前病歿。田中其人到底是不是一块“善玉”另当别论，但其继承和主导的“保守本流”的政治成色，至今仍是日本政坛的背景主色调则是不争的事实：直到其因脑梗塞病倒、丧失语言和行动能力的 1985 年，田中一直是政坛的幕后操盘手，不折不扣的政治枭雄、“造王者”（King Maker）；直到今天，源自前身田中派的町村派，仍然是自民党内最大的实力派系。

作为日本尚健在的头号大牌政治记者，渡边与战后历届首相及实力派政治家均有过从，可谓阅人无数。同时，政界人脉多多，从政机会数不胜数。经他介绍，做政治家、甚至首相秘书官的记者同僚、部下有之；前首相三木武夫也曾说服其弃纸（报纸）从政。况且，渡边其人对政治本身并无“洁癖”，至少不讨厌。但他在长达 60 年的政治记者生涯中，却始终未曾有过“下水”的冲动，真正做到了“常在河边走，从来不湿鞋”。一般人会以为，这需要极大的定力。但对“新闻原教旨主义者”渡边来说，则未尝不是顺理成章的选择。在渡边心中，甚至连世界第一大报《读卖新闻》社长的位子都无所谓，“只要能将主笔进行到底。生涯，只想做一名新闻记者。”

报纸在任何国家都是社会公器。但对被称为传媒社会的日本而言，新闻界不仅仅是社会政治单纯的旁观者、报道者和评论者，在某种意义上，其本身就是现实政治游戏的参与者，是政治决策程序的有效一环。渡边恒雄作为政治记者的言动，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远的不提，从几年前，针对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罔顾中韩外交的失政、恶化，一再偏执于靖国参拜的问题，与《朝日新闻》主笔若宫启文（Yoshiyumi Wakamiya）长篇对话，指小泉作为政治家“没有教养”，到两年前做局，撮合前首相、自民党总裁福田康夫和民主党党魁小泽一郎实现峰会，动议朝野两党保守联合，日本媒体大力介入现实政治操作，以舆论本身来诱导、酿造舆论的主动投球的激进姿态令人印象深刻。是耶非耶，姑且不论。走到这一步，真正兑现了“第四种权力”则是一个事实。

也许，正因了这种显赫一世的权力，洞若观火如渡边恒雄者才宁愿放弃现实政治中“王者”宝座的逐鹿游戏，而甘愿做“无冕之王”，也未可知。

渡边恒雄 口述：《渡边恒雄回顾录》，伊藤隆、御厨贵、饭尾润 采访整理，[日]中央公论新社 2000 年版，2007 年文库版。

ENGLAND 英格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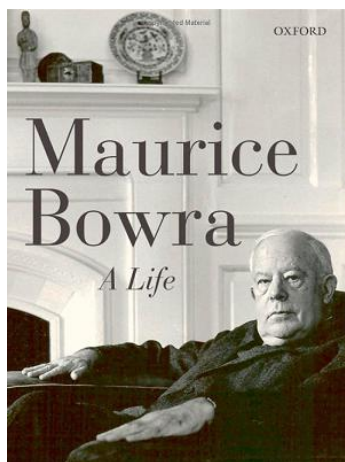
莫里斯·博拉与牛津传统

⁵ 1976 年 2 月，因美国上院多国籍企业小委员会上的证言而被新闻界曝光的航空业界黑金事件，系日本战后四大丑闻之一。美洛克希德公司通过对日本政府高官行贿，变更了全日空公司从美国采购的飞机机型。事件导致田中角荣政权下台，田中角荣及其秘书、前运输大臣及次官、全日空、丸红公司高官多人被起诉。一审、二审判决有罪。

特约撰稿人 孙晓骥（北京，seismometer2006@yahoo.com.cn）

莫里斯·博拉（Maurice Bowra）的名字，除了钻研古希腊历史的专业人士以外，恐怕无人听闻。但提起伊夫林·沃尔（Evelyn Waugh）的《故园风雨后》，董桥的读者们则再熟悉不过。只是，少有人留意到小说中带领塞巴斯蒂安毕业旅行的山姆格拉斯先生，这位来自牛津万灵学院的教师，正是以莫里斯·博拉为原型。

小说甫一出版，作为学生的沃尔便给时任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Wadham College）院长的博拉寄去一份样书。博拉对那个并非主角却与自己颇为相似的人物赞不绝口，甚至在给沃尔的回信中连用了三个“精彩卓绝”。需知，博拉说话一向以刻薄著称，他曾经称奥顿是个只知喝酒不做学问的庸才，痛批政府为托尔金授爵。他的同行，古典学教授爱德华·弗兰克尔（Eduard Fraenkel）更是被他奚落为“一无是处的市侩”。而旁人对于经常“出言不逊”的博拉也绝不会嘴下留情，以至于以赛亚·伯林拒绝承认博拉与自己有过交往。如此，对于沃尔书中自己不太负面的形象，博拉的欣喜之情自然出于意表，即使那不过是个有些愚蠢、迂腐的教员。



《故园风雨后》的跟风之作不少，亦有好事者在此类以牛津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中寻章摘句，将某些角色与博拉对号入座。但作为 20 世纪牛津大学颇具影响力的人物，莫里斯·博拉若仅仅出现于“稗官野史”和人们的臆测之中未免可惜。现实中的博拉如何影响了牛津，牛津又如何塑造了他，这是莱斯利·米切尔（Leslie Mitchell）在《莫里斯·博拉的一生》（Maurice Bowra: A life）中将要解答的疑问。

博拉 1898 年出生于江西九江，供职于中国海关的父亲却没有给他更多了解中国的机会，在博拉幼年的时候就将他送回英国的私立学校就读。1916 年，博拉考取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并进入沃德姆学院，在因一战而搁置了一年的学业后，他重回牛津师从古典学者莫里（Gilbert Murray）研读希腊典籍。自 1922 年成为沃德姆学院的教员起，博拉再未离开过牛津大学。1938 年，40 岁的他被选为院长。博拉将这个职位保持了一生，并在五十年代一度成为牛津大学副校长。对博拉而言，牛津不啻为其毕生倾心注血之所在。至于他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当上大英帝国研究院主席、受封进爵等等则又是后话，

本文按下不表。

若单表博拉与牛津大学，则无法绕开受博拉影响的一代牛津学人。奥顿曾将他们统称为“博拉集团”，并说道“在一个时期，当几乎所有的年轻人困惑于自己的信仰和人生观时，他们的个性，以及举止、言谈、思维，都在博拉的那一时期被塑形，并伴随其一生”。从经济学家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到艺术史家克拉克（Kenneth Clark）；从诗人约翰·贝哲曼（John Betjeman），到政治家休·盖茨克（Hugh Gaitskell），博拉的圈子几乎达及人文学科各个领域。至于哲学家汉普夏尔（Stuart Hampshire），艾耶尔（A. J. Ayer），以及以赛亚·伯林，更是与博拉有过深交。

虽然门下弟子多有与政界往来者，但博拉本人很少谈论时政。对于政治的喧嚣，博拉认为这“侵损了他静谧的思考，而对于政治的狂热感情则有害于他那纤细、敏锐的感受力”。因此，对于自己引为同侪的晚辈休·盖茨克弃学术而从政，他一直耿耿于怀。直到 1963 年，当上工党党魁的盖茨克去世，博拉也未原谅这位“背叛师门”的学生。

而对于信仰科学主义的作家，博拉也一概否定。佐拉、威尔斯、萧伯纳在他眼里均不值一哂。“任何作家皈依科学的唯一后果就是艺术感的丧失”。终其一生，博拉始终相信古希腊文明高于他身处其中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而在古希腊文化中，博拉独爱诗歌与文学，却视古希腊科学之价值为无物。在他所推崇的个人中，你可以找到萨福和品达，却绝不可能发现阿基米德或亚里士多德的影子。

在生活中，他却践行着上溯自维多利亚时期的二十年代文人的风逸与不羁。牛津的彻韦尔（River Cherwell）河畔以前有一处被称作 Parson's pleasure 的地方，常给男教师裸泳做日光浴，女士止步。有一天，一艘载着女客的船不小心闯入禁地，引起了骚动，男士们赶忙遮遮掩掩。别人都遮下体，唯独博拉此时却用手去遮他的老脸。事后，他说，你们这些人遮哪里我不知道，“但我这张脸在牛津可是尽人皆知啊（My dear, in Oxford I am known by my face）”。

若单从以上三方面审视，博拉岂非一个成天放浪形骸、思想偏激的隐逸之士？其实不然。拥趸古希腊自由民主政治的他，无时无刻不希望以雅典学院式的自由影响周遭的人们，而非强加于人。因此，虽然博拉个人反对科学主义，但他也公开表态，“当代牛津的基本任务有四：培养领袖人才，科学研究，培养新型的学者和科学家，通过学院传递文明。”而在二

战期间，“不问政治”的博拉更是暗中帮助伯林等来自俄国、德国的学者引渡欧美。

以此观之，博拉倒也颇识大体。只是忧虑于牛津古老的自由学术传统在 20 世纪的命运，让博拉有时难免偏执于一端，以期影响后学与同辈，使此种希腊式的自由传统不至于倾覆。

作为典型的中世纪大学(studium generale)，牛津大学的建立可上溯至 1096 年学者们自发的教学活动。随着杰弗瑞·卢西(Goeffrey Lucy)在 13 世纪初被任命为牛津大学校长，牛津也开始被称为 universitas，这标志着牛津大学由一个同人性质的学者团体，独立为一所学术机构。此时的牛津具备了大学原初的两个涵义：首先，大学是探索宇宙通则的场所，另外，它也是学者组成的社团。时至今，这种理念依旧影响着牛津大学，成为牛津大学理念中最深远的一部分。

在 19 世纪轰轰烈烈的牛津运动当中，纽曼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大学理念的演讲，他的基本理念是：与学者的小圈子比起来，大学更是探索普遍学问的场所。继而兴起的，是以赫胥黎为代表的科学教育理念。他们已经不满于牛津精英教育的传统，转而倡导平民的科学教育。通过历次运动，牛津大学成为了一所更为专业化的学府，但同时，博拉却认为，在为学生创造自由理念和对人文理想的追求上，牛津似乎有着过于“平民”和“大众”的趋势。设若博拉活到今天，对于大学设置 MBA 和网络远程教学等“敛财”之举，定有更为辛辣的言论，只可惜，我们再也无法听到。

拉斐尔名画《雅典学院》描绘的自由学术氛围无疑博拉心目中理想的大学精神，但这种自由绝不等于知识的泛滥。换言之，大学之道贵在“熏陶”，而非“传授”。林语堂当年引证牛津的导师制，称师生间的思想激荡全凭一只烟斗吞云吐雾。这也决定了此类教育的受益者只能是“小众”。今天的牛津，喷烟的导师越来越少见，但“自由”与“精英”的意味却未减损。如果我们不将“精英主义”理解为一种偏狭，那么无论博拉之于牛津还是牛津之于博拉，都称得上是一笔财富。

Leslie Mitchell, *Maurice Bowra: A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eb 2009.

GERMANY 德意志

在德国逛书市

杨不风（德国·图宾根，asukashinjirei@gmail.com）

荷尔德林塔旁边的“女士书店”门口依然摆着阿伦特的画像，威廉大道上的旧书店 Bader 照旧常常把新到的哲学旧书摆在狭窄的楼道旁，不过，在图宾根大学攻读人文学科的中国学生已经不像先刚博士在此求学那阵子那么缺乏淘书经验了。先刚博士曾于 2007 年 8 月份的《文景》上发表过一篇《图宾根书店琐忆》，细细回味了在此处遁迹于书林的乐趣，不过显然，他的淘书功夫不如而今几位晚辈后学高超。那会儿，图宾根的弗兰克（Manfred Frank）教授——一流的德国唯心论研究者、综合英美分析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可以向他炫耀在无人识货的杜塞尔多夫坊间寻获了一本施莱尔马赫 1859 年版《辩证法》，现在，一位中国同学却能够不无得意地告诉弗兰克教授，自己在图宾根只花了 0.5 欧便买到了著名学者瓦尔特·舒茨（Walter Schulz）——这位舒茨的份量可从一件小事上略见一斑：1958 年他拒绝了前往弗莱堡接任海德格尔教席的邀请，一生都在图宾根任教——的名作《德国唯心论在谢林晚期哲学中的完成》。如果弗兰克教授得知另一位中国同学也就是在这里淘到一套 1817-1828 年初版的施莱尔马赫译柏拉图作品集，所费不过 30 欧，一定会称赞中国学生的眼力，羡慕中国学生的运气。甚至，中国学生淘书经验的增长还表现在，有男同学冒险跨进了“女士书店”的大门，于是知道，不是门口抽烟的阿伦特画像让男士望而却步，这家书店根本就是“男士免进”。

好读书、好藏书的人在德国是要享福的，尽管我认识的朋友里有的是老道的书虫有资格来谈谈在德国逛书市经验，但我这个眼力不尖、见识不济的书虫也忍不住要越俎代庖，评点一番短短半年来在这里寻书购书的收获。

不过，要谈论德国书市的行情，却得先做点准备功课，说明一下德国一般的经济情况，否则，即便是那些相对价格已经十分低廉的书籍，按汇率将它们的价格换算成人民币也要让国内的朋友瞠目结舌。只有将书籍价格与其国民收入略作比较，然后再反观国内，才能对德国书市有个适当的印象。

图宾根与弗莱堡、海德堡这两所大学城一样，位于德国西南部的巴登-符腾堡州。按照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巴符州与它毗邻的巴伐利亚州的国内总产值在德国十六个联邦中一直分居第三和第二位，仅次于北威州，在历史上，这两个州

所属的西南德地区便一直是德国文化经济鼎盛之地。巴符州统计局在其主页上提供了一份 2003 年的家庭收入与支出统计报告, 根据这份报告, 当年巴符州的平均家庭税前月收入为 4027 欧, 税后每户平均月支出为 2311 欧, 这其中用于吃穿的计有 435 欧, 占 19%, 住宿花去 739 欧, 占 35%, 交通和各项信息费用花去 435 欧, 占 18%, 用于闲暇娱乐、文化和教育的有 292 欧, 占 13%。按平均每户家庭两人计算, 大概人均税前可支配月收入 2000 欧左右, 其他各项也依此均分。另一份 2008 年的整体经济报告则显示, 巴符州 2006 年每位居民人均可支配月收入为 1654 欧, 略高于全德 1511 欧的水平。2006 年巴符州国内总产值较 2003 年增长了 7%, 2008 年则较之增长了 16%。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的话, 目前巴符州的居民收入与支出情况与 2003 年相比大体依旧, 全德的平均生活水平则低于巴符州。

事实上, 这些统计数据显示的是德国一般家庭的良好生活质量。德国西南部一般的失业救济金在 350 欧上下, 而以我在德国半年的短暂生活经验来看, 每个月 250 欧便可以住到很不错的单间, 100 欧就可以允许不时聚众饕餮一次, 再加上 100 欧左右的信息、交通以及保险费用, 每月 500 欧便可以保障不错的基本生活。

而按上海市统计局的数据, 上海市 2007 年人均可支配月收入为 1969 元。且不论这个平均值里有多少是将占少数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平均到了大多数低收入者身上, 即便以此为依据来比较中德书市的行情也会发现, 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读书也成本不菲。

要看书市的行情, 自然先要了解新书的价位, 虽然我们平日逛得最多的是旧书店、旧书网。刚到图宾根时便听朋友推荐, 威廉大道上有家纯粹的学术书店 Willi, 主售哲学和神学类学术书籍。黑格尔、谢林、荷尔德林在图宾根新教神学院度过了他们最具思想爆发力的一段年轻岁月, 现任教皇本笃十六世曾在图宾根天主教神学系任教, 哲学与神学本也就是融入德国文化血液中的酵素, 图宾根有这样专门的书店自然不足为奇。而且细说起来, Willi 偏向于哲学, 有位我们认识的店员 Hartmann 先生便是在图宾根拿了哲学硕士学位, 离 Willi 五十米开外的地方有家同样知名的 Gastl, 店主则偏好神学。但由于我专业、兴趣所在, 且将 Gastl 按下不表, 单说 Willi。

话说当时德国最出名的出版社之一 Meiner 出版的一套精装六卷本黑格尔主要作品集正打特价, 49.98 欧。纯墨绿色的绒面封皮, 上面嵌着红条金字, Willi 将其摆在橱窗里展示。这套黑格尔作品集收入了黑格尔生前自己以著作形式撰写并出版的著作, 计有《耶纳时期批判著作》、《精神现象学》、《逻辑科学》(即俗称《大逻辑》)、《法哲学原理》和 1830 年《哲学全书纲要》, 以黑格尔协会 1968 年开始重新编订的全集本为依据(第五卷《法哲学原理》据“哲学图书馆”本), 乃是最好的版本。我便兴冲冲地跑去 Willi, 迫不及待将其揽入怀中。那是第一次进 Willi, 不大的两个进间, 四壁的书架大致按出版社摆放图书。因为几家规模较大的出版社如 Meiner、Suhrkamp 和 Reclam, 所出经典普及图书均以书系形式呈现, 是其标志性出版物, 各自以醒目的独特颜色加以标识, 像 Meiner 的“哲学



Willi 书店

图书馆”书系纯为天青色, Reclam64 开本的口袋书或鲜黄色或橙红, Suhrkamp 的则多为黑色或其他深色, 所以 Willi 的书架望过去几大块醒目的单色, 蔚为壮观。

这类特价书都有时限, 这套黑格尔集如今就已涨回原来的 138 欧。不过如此低折扣的出版社特价版书籍并不少见, 在 Willi 的橱窗里一直可以看到慕尼黑版 33 卷本精装歌德全集, 售价 199 欧。特价书主要集中在那些举世闻名的作家、思想家身上, 也不限于德国人, 我也曾在 Willi 看到弥尔顿、艾伦·坡等英语作家的德译特价作品。想必这些作家的作品需求多、销量大, 所以能够以低廉价格惠及读者。著作权过期当然是个原因, 不过许多德文书籍尤其是全集的编纂工作耗时数年甚至数十年, 编辑版税十分高昂, 书价也就相应水涨船高, 例如上文提及的新编黑格尔全集每一卷售价便近 200 欧。所幸出版社又能以那些最权威、最优良的版本为底本推出一些低廉的特价版, 特价期一般至少持续半年, 实在是替读书人着想。甚至一些卷帙浩繁的辞书、工具书也会有特价, 比如在 1909-1913 年首次出版, 至今经过四次重编, 现共计十卷、一万多页的《宗教的历史与现状》(Religion in der Geschichte und der Gegenwart, 简称 RGG), 原价 2250 欧元, 去年秋天便推出一个九卷小开本特价版, 售价 498 欧。

此外还有一种特价书, 是那些在品相、质量上略有瑕疵, 看起来却完好无缺的书, 往往会打上“瑕疵本”的印章以

半价销售。或者书店为了处理一些库存书，但德国法律规定书店不能擅自打折，于是书商便会以瑕疵本为由将其打折卖掉。Willi 书店的里间便有不少这类打折书，所以每次一到 Willi 我们便直奔而去。我在别处买过一本这样的瑕疵本：Karl Vorländer 著的《康德：其人与其作》，学界公认最好、资料最详实的康德传记。原价 14.95 欧，我不过花了 4.95 欧，厚厚 400 多页，即便国内也要这个价格，更何况国内许多书并非物有所值。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另一个非常杰出的出版社——达姆城（Darmstadt）的学术图书协会（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简称 WBG）。WBG 成立时的背景并不光彩，它是在因与纳粹合作而丧失名誉的历史学家 Ernst Anrich 推动下于 1949 年创建，目的一是弥补当时学术文献的缺憾，二是为许多因纳粹问题被大学革除的学者提供一个谋生之所。战争导致许多学术书籍佚失，学术资源匮乏，WBG 选择了将那些在战后很难寻获的学术书籍进行重印，对于德国学术的恢复无疑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一业务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至今，每年仍有约三分之一的书籍是从其他出版社购买版权后由其重印发行。WBG 一直采取会员制销售，凡成为它的会员，便可以以会员价直接向其邮购。每年的会费，学生 5.5 欧，非学生也不过 11 欧。有了网络后，直接在其网站订购即可。

WBG 版虽然在装帧和纸质上不如原版，价格却往往相当于原版的 5-8 折，去年年底我从 WBG 订购了一套施莱尔马赫译的希德对照本柏拉图全集，八卷本，99 欧。这套全集的希腊文取自法国学者 Budé 校勘的希腊文本，质量上仅次于英国牛津出版社的 Classical Texts 校勘本，而施莱尔马赫的德译虽然拗口，却相当贴近希腊文原文，所以虽然柏翁著作的德译层出不穷，施译仍旧作为古典语文学的一个典范受到推崇。谁料今年 WBG 周年庆，这套书也列入特价书目，现价不过 49.9 欧，不禁让穷书生捶胸顿足。而我买的另一本《奥古斯丁〈忏悔录〉章义》，甚至从原来的 34.9 欧跌到了三折。其他的特价好书更是数不胜数。WBG 对于德国学术的繁荣与传播之功可见一斑。

事实上，即便不看特价本，德国各大出版社出版的经典普及本，价格相对于德国居民的一般收入而言，也是很低了。



德国出版社的书籍定价相当符合市场规律，一般而言，二手学术研究文献和校勘研究版文集售价往往以精装印行，售价高达 100 欧甚至更多，印量不多，许多书出版一次便不会再版，这些书的销售对象不是个人而是图书馆和研究机构，以德国庞大的图书馆采购而言，完全可以消化掉这些专业出版物。研究类著作也常常由一些专业的出版社出版，比如位于图宾根的 Mohr Siebeck 出版社只出神学、哲学、法学、经济学和犹太研究类著作，法兰克福的 Klostermann 则以海德格尔全集和托马斯·曼研究闻名。在许多德国知识分子的回忆录里都可以看到，专业出版商在他们的知识生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如果做一番历史研究，甚或可以发现出版业对整个近现代思想史走向的影响。

再者，某些研究著作和校勘研究本作品集一旦产生重大影响便会重新大量印行，价格自然降下来。新康德主义学者保尔·纳托普（Paul Natorp）1903 年发表的《柏拉图的理念论》当时即影响了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许多学者的研究思路，可谓以柏拉图主义解读德国唯心论的代表作，经过近一百年的检验，这本书早已成为唯心论研究中的必读书目，2001 年 Meiner 再版了此书，售价不到 10 欧，当然这里也有版权过期的因素在内。由意大利学者 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编辑的批判研究版尼采全集（通称 KSA）更能说明市场决定价格，这一套 15 卷的口袋本全集价格仅 138 欧，而且自 1980 年初版以来多次再版。

我关注的基本是学术类书籍，Willi 书店十步开外另有一家 Osiander，则陈列种类繁多的泛文化类图书。Osiander 是图宾根规模最大的书店，400 多年历史，分有三处门面。Willi 附近的是总店，上下三层，店内装修非常现代，好比上海的季风、北京的风入松、杭州的枫林晚，面积要大许多。一楼大厅里陈列的多是文学文化类畅销书，大致翻看一下价格，多在 20 欧、30 欧上下，例如去年荣膺权威德语文学奖——德国图书奖的乌韦·特尔卡普（Uwe Tellkamp）的《塔》，一部描写东德衰亡的巨作，精装，976 页，定价 24.8 欧。特价版似乎是德国出版业的惯例，文学类书籍也不例外，本来已经畅销的书籍，书商还会推出一个廉价版。随着描写德国 1960 年代崛起的学生恐怖组织红军派（RAF）的电影《Der Baader-Meinhof-Komplex》去年 10 月热映，电影的同名原本纪实体小说也登上了畅销榜。这部由前《明镜》周刊记者和编辑 Stefan Aust 撰写的小说 1985 年初版时便以其大量翔实严格的细节描写掀起轰动，1997 和 1998 年两次再版，去年则推出一个全新修订和扩展的特价版，672 页，不过 10 欧。

不过，最惬意的还不是买新书，如果在一家旧书店一番辛苦淘到几本钟意的好书，其中乐趣识者自有体会。我在国内本无淘旧书的爱好，但到了德国，一是因为德国出版业发达，几百年保存下来的出版物数量庞大，使得旧书市场格外繁荣，

二来书籍纸质优良，18、19 世纪出版的书拿在手里结结实实，放了几十年的都不见怎么发黄氧化，抚旧如新，三则旧书毕竟比新书便宜许多。图宾根南城有一家叫做 Zimmer 的旧书店，店主是一对看起来年近八旬的老夫妇，以及一只活蹦乱跳的黑色狮子狗。书店是一栋长方形的房子，独自坐落在一片安静的住宅中。周围道路纵横交错，我至今记不住准确的路线，每次要么有朋友带路，要么估摸着大致的方向四下里误打误撞，不经意间那方盒子便会出现在视野中。Zimmer 的面积说起来不小，里外里大约 50 个平方，因为四壁和过道上都层层叠叠堆满了旧书，自然显得狭促。靠墙的书架一直顶到天花板，每一层都排满了各种开本的书，书里必然夹着一张写着号码的纸条，



Zimmer 书店

老先生和老太太便凭这些号码从他们的电脑系统里查询书籍的相应信息，故而每次看到新面孔，老太太都会叮嘱一番：不要将书中的纸条弄掉。店里书的品味和品相都相当好，据说几个朋友刚刚发现这家书店时，看到为数不少的 Oxford Classical Texts 系列的古代经典著作，被他们洗劫一空。我自己也曾看到很多 Artemis 出版社 Tusculum 系列的希德或者拉德对照本古代文献，至于各个版本的莱辛、歌德、席勒全集和其他浪漫派作品更是时时可见。很诧异老先生一大把年纪从哪里搜罗来恁多好书，只是有一次闻说，神学系一位教授去世，他上门收书，后来两位学神学的朋友便满载而归了一回。

Zimmer 最让我们喜欢的是老先生和老太太的慷慨与厚道，卖给我们时常常按原订价格打五折。开头说到的那套施莱尔马赫译柏拉图和瓦尔特·舒茨的名作，朋友就是在这里淘到。更奇的是，进了店门右手边有一个长长宽宽的架子，上面铺了一摊书，全都一元一本。第一次去 Zimmer 我便撞见一套十卷本的康德作品集，最通行的 Wilhelm Weischedel 编辑本，收录了康德生前发表的所有著作，WBG1970 年代的印本，新书 49.8 欧，这套虽然缺第一卷前批判时期著作，却比大白菜还便宜。另有一套 Suhrkamp 旗下的 Insel 出的十二卷本里尔克全集，缺了五本，至少有我想看的《马尔特手记》。

我们隔三岔五便去 Zimmer，以至于那的哲学类好书已经被搜刮得所剩无几，当然，历史、艺术和文学类的书籍还不计其数。好几次问主管录入信息和查询的老奶奶，某本书还有没有，她都面带笑容地说：“已经被你的中国同学买走了。”

Zimmer 去得多了，以至于我们买再贵点的旧书都觉得舍不得，其实老先生几乎在做慈善事业，不能说明一般行情。别家的旧书几乎不会有低于 5 欧的旧书，多数都在 10 欧以上。威廉大道上的 Bader 书店也是我们常常光顾的地方，价格比 Zimmer 高许多，其实挺公道。曾经去斯图加特北部的路德维希堡逛过一次旧书展，参展的旧书店老板们不知是欺人不懂行，还是仅仅凑热闹展览一番，书价动辄成百上千，却未必是什么好书。只有 Bader 的老板在角落里摆了一个小摊位，笑眯眯坐在那里，尽管价格比在店里时高了一些，但相比之下也可见其实在。

图宾根老城警察局对面还有一家 Ecker，一间非常古旧的房子，想必是 19 世纪的建筑，墙壁是用巨大的石块垒砌，室内空间呈拱形。面积特别大，地上一层再加一间地窖一般的地下室，同样堆满了书，可惜好书不多，而且价格不厚道。我初来时不懂行情，在那里找到本 Manfred Frank 的书，还有一本雅斯贝尔斯的成名作《尼采》。书里都有阅读过的划痕，价格却都将近 10 欧。后来才知道，这类一旦有了划痕的书，价格就会缩水很多，多不会超过 5 欧。况且这家的书堆在地窖，暗不

见天日，书里一股除不去的霉味，后来我便再也没去光顾过。



且哪里是旧书，根用印有古旧印刷

本是地地道道的新书，毫无任何使用痕迹。那套荷尔德林全集，书店老板作坊工作场景的漂亮画纸整整齐齐包扎好，打开来，卷卷印刷精美，字典纸印刷，字体柔软，每卷都有 800 多页，拿在手里不显厚也不觉重。慕尼黑版的荷尔德林全集虽然不及斯图加特版和法兰

除了逛旧书店，类似“孔夫子”的旧书网也非常发达，而且规模要大许多，不光德国，欧洲各地的旧书商都在上面交易。我最常用的一个叫 Zentrales Verzeichnis Antiquarischer Bücher。因为有了网络，所以各地的价格相差不多，不过搜得勤快点，运气好便能碰到很划算的好书。几个月下来我买了一套三卷本的慕尼黑版荷尔德林全集，

一套 KSA 版尼采全集，前者不到 40 欧，后者 90 欧。而

克福版权权威，却也是学界通用的本子，它的一位编者 Michael Franz 是图宾根的讲师，这学期上了他的荷尔德林研讨课，是位为学细密、为人朴素的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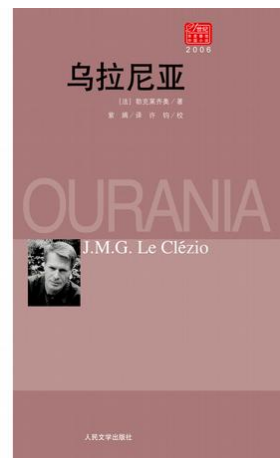
按照德国居民的收入水平，这样发达繁荣、运转合理的图书业自然让他们轻而易举就享受到阅读的乐趣和钻研的便利，难怪大多数大学的私讲师，拿不到教授席位，收入不高，买起书来却一点不含糊。在此访问留学的人就得抓住机会，好好攒下批书来。二月底的时候帮一位准备回国的台湾学长搬行李。这位学长在图宾根读古典学，已然负笈十载。说是搬行李，其实就是搬书。装香蕉的水果箱总共五、六十箱，我们六七位朋友花了大约两个小时从他住的三楼搬到楼下，然后等着一家汉堡港过来的货车将它们拖走，这批书就要靠一个集装箱走海路颠簸万里运回台湾。等车的时候一个朋友开玩笑说要拦路抢了这批宝贝，后来联想到这书走海路大概要过索马里，学长一查航线，果真如此。一千人便顺着编起故事，说那索马里海盗还真抢了这批书，开箱一看，竟是古今泰西各类文字书写的书籍。自从载了这批书的货船被劫后，索马里海盗竟就此销声匿迹，数十年后崛起一个索马古典学派，而索马里境内已是一片文风斐然。这批足以建立一个小型图书馆的书籍就是学长在德十年淘书的成绩，我们这帮朋友也早早在合计着回国时包个集装箱将书一起运回。

BOOK REVIEW 书评

勒克莱齐奥：永恒的漫游者

特约撰稿人 凌越 (广州, iamlingyue@yahoo.com.cn)

借助诺贝尔文学奖这只大功率的探照灯，中国读者又认识了一位卓越的当代外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原本他们有机会更早和他结识，因为早在 1983 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沙漠的女儿》，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他的另六部小说《诉讼笔录》、《少年心事》（金龙格译，漓江出版社，1992 年）、《战争》（李焰明、袁筱一译，译林出版社，1994 年）、《流浪的星星》（袁筱一译，花城出版社，1998 年）、《金鱼》（郭玉梅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年）、《乌拉尼亚》（紫嫣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又相继在中国出版，可是勒克莱齐奥的身影似乎总是被遮蔽在迷雾之中，他的每本书的印数都很少，最少的《少年心事》只有 2400 册，最多的《乌拉尼亚》也不过 8000 册，而且没有一本书在读者甚至文学界中产生过影响。中国人虽然普遍不具备很好的阅读习惯，但是对于法国文学已经算是熟悉的了，比如萨特、加缪、杜拉斯、罗伯-格里耶、尤瑟娜尔等都在中国都较大的影响力，可是勒克莱齐奥是谁？在 2008 年 10 月 9 号之前，恐怕没有多少中国读者知道。2008 年初他的小说《乌拉尼亚》获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在颁奖之后顺便安排了一勒克莱齐奥的作



品讨论会，与会者不过十人而已。我们可以试想一下，下次勒克莱齐奥再次到中国时，将会遇到怎样的媒体轰炸。许多时候，人们热爱文学奖要远远超过热爱文学本身。

勒克莱齐奥获奖后，中国媒体普遍做了大篇幅的介绍，在众多被媒体选用的照片中，有一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是 1963 年 11 月 19 日，勒克莱齐奥和他的妻子一起接受伽利玛出版社访问的照片，摄影者是摄影史上的大师级人物布列松。照片上的勒克莱齐奥显然经过精心的修饰——身着西服，头发梳得整齐，脑袋侧面的发线清晰可辨，可是他随意扎在衬衣领上的窄领带透露出他其实不羁的内心世界。他两手握在一起，面部向左侧倾，看着照片外的采访者，那是一张英气逼人的脸庞，高耸的鼻梁和丰满的嘴唇，会让人误以为眼前这位小伙是哪位电影明星呢，他的右侧坐着他美丽的妻子玛丽娜，玛丽娜穿着当时流行的格子连衣裙，很宽的衣领，中间饰有一排纽扣，她的眼睛很大，眼神骄傲略带虚无，像极了那个时期新浪潮电影里的那些女主人公。她正不无几分茫然地看着右边某处，和正专心接受采访的采访的勒克莱齐奥构成某种奇怪的张力。面对这张照

片，谁都以为是某对接受采访的电影明星。当然，当时的勒克莱齐奥正是冉冉升起的文学明星，他才 23 岁，而他的第一部小说《诉讼笔录》就为他赢得了勒诺多文学奖，这部带有虎虎生气的处女座有着耀眼的才华和猛烈，但却少有一般少作的稚嫩，立刻赢得当时文学界的交口赞誉，赞誉者甚至包括著名小说家雷蒙·格诺、让·吉奥诺，哲学家福柯、德勒兹等。而作者又是如此年轻英俊，他的妻子又是那么美艳动人，当时勒克莱齐奥刮起的旋风可想而知了。

我手头有除了《沙漠的女儿》之外的六部勒克莱齐奥的小说中译本，最吸引我的仍然是他的这本处女作《诉讼笔录》。小说情节很简单——一个离家出走的 29 岁男人种种古怪离奇的经历：他潜到海边一所废弃的别墅居住，整天无所事事，万般无聊之时才上街作些必要的采购；他在海滩闲逛，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溜达，间或给一位叫“米歇尔”的姑娘写信，当然信的内容构成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和这位姑娘的关系也颇为暧昧，在他们的对白里，他似乎暗示他曾经强奸了这位姑娘，但是姑娘对他似乎又是熟识的；他去动物园转悠，他去跟踪一只狗，然后在随后的一章中，他想见办法用室内的台球打死了一只老鼠；米歇尔和一个美国人在一起，他去找她时，被那个美国人痛扁；他在海滩突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内容的空洞和疯狂让他被带进了疯人院；最后他在疯人院安静的似乎是正常地接受一群年轻的实习医生的调查，小说最后是这位年轻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仿佛置身于牡蛎之中，而牡蛎沉入了海底”。

对了，这位古怪的年轻人叫“亚当·波洛”，这绝非偶然，勒克莱齐奥显然不想把他的主人公当作是一起离奇事件独特的参与者，而是试图给予这个人物某种抽象的象征的旨意，使他恍惚中竟然成为人类某种极端状态的化身。因此对于这个人物的生平，书中只是给予了最为简省的介绍，而且是通过他收到的母亲的信顺便提及的：“我们本以为你服役刚回来，身子很累，可以在我们身边好好歇歇。”但是显然，他没有那样做，而是留下一张小纸条，离家出走了。也就是说，亚当·波洛是一位退役的军人，在多年后，2007 年勒克莱齐奥接受法国《观点》杂志的访谈中，他回忆了当年写作《诉讼笔录》的背景：“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阿尔及利亚战争还没结束，被送到军营里的威胁还在男孩子头上盘旋。我的一个同伴，一个非常艺术气质非常反抗的男孩，叫文森，因为成绩不好 1960 年末去打仗了，而且马上在一次埋伏中被杀害了。另一个得到许可回来了，被洗了脑，只会谈论反坦克火箭筒和“特殊马铁罐”（就是人们遮遮掩掩地称为“凝固汽油弹”的东西）。有些伙伴为了逃避就朝自己脚上开枪，或者是注射咖啡因假装心动过速，造成精神发狂，结果在军事医院经过几星期治疗之后，真的得了病。”从中不难看出亚当·波洛在生活中是尤其原型的，可是勒克莱齐奥在小说中刻意简化战争背景是明智的，因为亚当·波洛的貌似离奇的举动在根本上揭示了某种人类的困境，而不会降格为仅仅是对某次具体战争的抗议。

许多评论者都提到勒克莱齐奥对于小说情节的淡化，比如整本《诉讼笔录》，你很难找到我们习以为常的所谓情节冲突。在我看来，这一点得益于 20 世纪整个法国小说的发展，以贝克特、罗伯-格里耶为代表的新小说作家早就从方法论上摒弃了那种试图恢弘地再现时代的小说，当然另一方面当代的语言哲学和符号学、人类学的发展，又使得他们在理论上得以发展出“见微知著”式的小说新思潮。上世纪 60 年代，作为年轻的有抱负的小说家，勒克莱齐奥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实在是水到渠成。这些法国作家都明白一个在他们看来如同常识般的道理，即小说情节的淡化和背景化，正好给词语腾出了表现的空间，每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都因此显得意味深长。大批法国当代作家正是以此为起点展开创作的，也就是说，他们一较高下的舞台其实是在后者——词语的表现。在这一点上，在我看过的法国当代作家中勒克莱齐奥显然是出类拔萃的。有论者提到，罗伯-格里耶的描述式的“客体主义”对勒克莱齐奥的影响，在观念上这种看法也许不无道理，可是在具体的描述过程中，我以为勒克莱齐奥明显更具才华。罗伯-格里耶的小说的描写经常给我生硬之感，也许他太恪守自己提出的新小说的各种规条了。德国著名电影史家乌里希·格雷戈尔曾经在《世界电影史》（郑新等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 年）中批评罗伯-格里耶电影里的人物如同蜡像馆里的人物毫无生气，这也是我看罗伯-格里耶小说时的感受。勒克莱齐奥的描写则要敏感和有力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勒克莱齐奥对于诗歌的热爱，比如他最喜欢的作家是两位诗人：19 世纪早逝的天才诗人洛特雷阿蒙，以及 20 世纪大诗人米肖。在他早年的小说《寒热病》的前言中，他像诗人般的谈到词语：“写作就是用词语进行探索，深入细致地研究并描绘，紧紧抓住词语，毫不通融地刻画现实。”看勒克莱齐奥的小说，很多时候有诗的感觉，勒克莱齐奥像许多经验老到的诗人一样，听凭词语的牵引，在最细微处，在被许多作家忽视的瞬间，他到时能有所发现甚至是对生命的最本质最神秘的发现。

举两个例子。在《诉讼笔录》中我以为有两节写得格外精彩，一节是 H 节，写亚当在山顶那间废弃的房子里发现了一只老鼠以及打死老鼠的过程，这么一个简单的情节，勒克莱齐奥写了 11 页，大约 5500 字（当然是以译成中文字数为准），而且写得惊心动魄。当亚当终于用台球击中老鼠，并用刀将老鼠逼到墙根，他这样描写绝境中的老鼠：“在它那两个黑洞的圆圈正中的透明的眼睛深处，显示出了对不可避免的命运的觉悟，对惶惶不可终日的死亡结局的醒悟，闪烁着一线湿润与

忧楚的反光，这份恐惧交织着对昔日暗暗的思恋，曾有过多少个幸福的春秋……”这哪里像是在写老鼠阿，这分明是对人世的某种深沉的喟叹啊。本节的最末是，亚当将死鼠扔出了窗外，“一从荆棘将收留下它的尸体，让它在太阳的照射下，在自由的空气中渐渐熟透”。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勒克莱齐奥紧跟着词语被带到了何处，也许这里远离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情节，但却紧邻繁茂的文学的花园。

在 M 节，勒克莱齐奥着力描写亚当在街头毫无目的地彻夜漫步，到后来似乎许多个亚当在街头漫步，他们同时出现在各条街道上，甚至“他有时会在街道上，在一座房屋的拐角处，与自己交臂而过”。这种超现实的幻象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勒克莱齐奥寄托在亚当身上的厚望，那就是这个疯疯癫癫的人物正是我们芸芸众生的精神肖像。“约五点（凌晨）的时候，他驻足停在一家洗衣店的橱窗。他因疲惫和欢乐而头脑发昏，感到类似泪水一样的东西在双颊上流淌；他突然放声哭了起来，毫无顾忌那成千上万家窗户在他身后打开。”这一节的漫游描写是勒克莱齐奥人生观的一个缩影，他其实想说的是，人不就是一个悲苦茫然无家可归的漫游者吗？我们在这世上匆匆走过，似乎带着某种明确的目的，可是到头来我们发现我们只是在做毫无意义地位移而已，我们能去往何处？在弄清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要走，走是走的唯一目的。存在一个更美好的乌托邦吗？至少在《诉讼笔录》中我们看不到任何迹象。从这两节文字，我们可以见识到勒克莱齐奥的小说语言的张力有多大，在小说任何一个细致的纹理里，他都有能力将我们带到物质和精神相融合的境界，通常只有卓越的诗人才有这惊人的伟力轻易地引领我们上升。

而亚当这个勤于走路的漫游者形象则为勒克莱齐奥后来的许多部小说定下了基调：

《流浪的星星》是写一个犹太女孩在二战结束后，和母亲一起出发去寻找传说中自己的家园，途中他们遇到了蔡玛——一个阿拉伯女孩，而蔡玛是在前往难民营的途中。《战争》走得更远一些，小说里只有两个面目模糊的人物 Bea.B.姑娘和 X 先生，那个姑娘带我们穿越城市穿越街衢，带我们走了很远很远的路，而 X 先生也时不时会来帮我们一把，会开着汽车来带我们看逐猎人类，会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恐惧和茫然。短篇小说集《少年心事》中则有多篇小说和漫游有关，《偷越国境的人》是写一群跋山涉水的偷越国境者的遭遇，《露拉比》中，主人公力求从“人群像枯叶一样飘落，男男女女像磁场中的铁屑一样聚集”的现实生活中解脱出来，她向往辽阔的蓝天和大海，她怀着对自由自在状态的追求，独自在海边冒险过了几天；《在神仙居住的高山》中，少年日翁在登山远足中，尽情享受其中乐趣，他不畏艰险，表现出一种超脱现实的潜在意志；《梦多》则描写了一个流浪的精灵少年梦多，他到处流浪，四海为家，和每一个相遇的人友善地相处，他无忧无虑，在每一处都在尽情

享受生活的赐予。后来梦多突然失踪了，岁月流逝，没有梦多的日子显得那么漫长，又去的那么迅速。“我们城里许多人都期待某人出现，却不敢说出他的名字”。后来有一天，那位曾经帮助过梦多的越南小妇人在自己花园的树下，捡到一块显然是梦多遗弃的鹅卵石，上面歪歪斜斜地刻着几个字：“永远热爱。”没错就是这四个字道出了勒克莱齐奥内心的秘密，我们看他的小说，哪怕是那种看起来极具试验性的小说，我们也总是能感受到某种亲切的令我们不自觉地动容的东西，也许正是那——“永远热爱”吧。在和导演戈达尔的谈话中，勒克莱齐奥这样说过：“如果作家没有人类高深的思想，如果对世上一切基本的东西、一切不愉快的东西没有一种情感的话，就不可能写出好东西，就无法表达写东西，无法表达自我。”从这段话，我们不难看出勒克莱齐奥和那些力求在形式上创新的作家的区别，我以为这也正是他高出一一般作家之处。哪怕是像亚当这样怪诞的甚至不无几分冷酷的人物，当他从勒克莱齐奥笔端流出的时候，我们依然感觉得到这位作家的情感和热爱，而这正是文字得以记载我们的呼吸和感触的唯一理由。

【法】勒克莱齐奥：《诉讼笔录》，许钧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年 6 月；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年 12 月、2008 年 10 月。



我们的索尔仁尼琴

特约撰稿人 朱航满（河北，zhm7976@126.com）

索尔仁尼琴去世的时候，友人感慨中国没有出现索氏这样的大师，真是愧对我们这个民族曾经遭受的苦难。这听来真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但近来夜间重读高尔泰的著作《寻找家园》（花城出版社，2004 年 5 月），却对这样的说法有些难以完全认同。这册《寻找家园》刚买来就读过了，但这次重温依然十分震撼，字字沾血，元气淋漓，读后真有仰天长啸之感。高尔泰写他的往事，如索尔仁尼琴一样，他笔下的劳改营犹如后者中的“古拉格群岛”，高尔泰说那地方像集中营，许多年后从兰州到酒泉的火车经过，车上的人还能闻到扑鼻的恶臭，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用太多的语言，犹如中国水墨画上的留白，任由你去想象那里曾发生过的残酷与可怕。他写劳改营的饥饿，写那里的荒凉，写那里的冷酷，写那里的苦难，而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却是在那样艰难残酷的环境中，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折磨，诸如他写几个右派一起到外地去劳动，有人竟然晚上假装睡觉观察情况，更有人假装在睡梦中呼喊革命口号，然后再借机察问以表忠心。他写自己亲历的人生苦难，动情处让人既难过又恐惧，诸如写到妻子李茨林的善解人意，活泼可爱，但却衬托出她命运的悲凉，二十五岁死在了下放的乡村荒漠，当他连夜赶到时，妻子刚刚闭上眼睛，而肚子里还怀着八个月大的孩子，岳母让他一遍又一遍的摸摸，再摸摸，直到那还温热的身体变得发凉。他还写世道沦丧，人心可畏，敦煌研究所的所长常书鸿先生，从海外留学回来，几十年来在这块偏僻的荒漠上，为中国文化守魂，但到头来却成为反革命分子，常常被批斗的鲜血淋漓，只能跪着在地上爬行，他一手培养和看好的学生在众目睽睽之下边狠心用巴掌打常先生的耳光，一边质问他何以别有用心的毒害年轻人……实在是不堪忍读，但又不得不读。



高尔泰写苦难，但却绝不因为苦难而丧失掉真实的自我，我能体会到他面对往事的那份克制与冷静，在愤怒的背后，他仍然给人性的温暖预留了精神的空间。他在夹边沟农场劳教，一位叫安兆俊的管理干部偶然看到他的日记，知道这其中隐藏的巨大危险，如纸包火，但他并没有因此致他于死地，而是暗中给予保护；他从农场劳教结束走投无路，绝望中给敦煌研究所的所长常书鸿先生写信，无所希望中却看到一线的光芒，从而改变了人生的轨迹；文革结束后，他的身份还没有改变，兰州大学的韩学本先生到地头亲自和他探讨交流，费劲周折将他调入到兰大哲学系；后来，他辗转转到四川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地任教，都是遇到了善良的人。无论怎样的时代和环境中，这世界还没有彻底地沦丧，因此即使再遭遇多少的坎坷和磨难，他都不会完全的绝望与悲观；而最使他感到惊讶的是，一九八九年他被关押在四川的监狱中，受到一个监狱审讯人员的优待，一直到出狱他都认为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真实。为此，他只有在文章中这样由衷的感慨：“去国十几年，与不同语言、肤色、异俗殊风的各国人等交往，最深的一个体验，就是人性的善恶。人这个物种的个体差异，和种族文明、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知识技能、社会制度和职业身份都没有关系。对于那些承担着制度的罪恶，戴着刑具的脸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量减少无辜者的痛苦，而又不为外界所知，甚至不为受益人所知的人们，我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和谢意。一直很想，不仅代表我和我的家人，也代表无数在绝境中因他们的看不见的、困难的和危险的努力而减轻了伤害的人们，衷心地道一声，谢谢！”

我读这些文字，不忍于他笔下的苦难，感慨于他笔下的温暖，而我更惊讶于他笔下灵魂的坦荡。一九七八年他去拜访常书鸿先生，那时他还是劳教人员，常先生因为美国作家韩素音的会见，被优待安排在兰州，但并不安全，岌岌可危，高尔泰拜访后不明情况，因此撒手而去，多年后他为此悔恨不已；更令我感到内心疼痛的是他写女儿高林的文章《一封未曾寄达的信》，用对话的语言，是生者与死者的交流，是父亲对于女儿的忏悔，一件件往事讲来，句句都是让人心痛，字字都让人流泪，写自己未能尽到一个父亲的职责，写因为自己的原因带给女儿的命运，从幼小到长大，一步一步都浸透着苦难，没有母亲，四处漂泊，疾病缠身，因为他的政治原因而被取消了到南开大学读书的机会，更因为对父亲流亡命运的牵挂，最终精神分裂，丧命黄泉，年仅二十五岁。这是我读到难得的忏悔录，面对时代的不公，他没有仅仅把责任推卸给历史，而是同样面对自己的心灵进行拷问。也因此，我读他写与第二位妻子不幸婚姻的叙述，却并不是推卸责任，而是客观叙述，描写两个不同世界的人生理念，但也不忘记赞叹这位女性在她的世界中的精神操守；而在夹边沟农场，在面对一个即将毙命的黄羊，他实在不忍心看着这样一个生命在自己面前垂死挣扎，因此恳求提早结束它的生命，但在难友的眼中，这黄羊只不过“是个菜”而已。他由此看到了强者对于弱者的绝对支配，人性中隐藏着的兽性，由兽性也产生出的人性。在这册书中，他也毫不避讳，更是写到了自己人性中的种种脆弱、卤莽、粗糙甚至是那些不足为奇的缺憾。在面对往事的沉思中，他为那些因为自己而备受苦难的生命点上了一柱心香。

我读到的这册《寻找家园》，只是先生写作中的一部分，且出版时还有一定的删节。如果将那些被删汰的文字都放在一起，那一定是一部可以与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可以媲美的伟大著作，而就我所看到的文字，就已经感到他在书写人的命运的卓越力量与才华。我惊叹于他在思想上的深厚与宽阔，也同样惊叹这样的思想诞生的根源所在，因为在这片思想贫瘠的土地上，为何那样多杰出的头脑都枯萎了，他们经受的苦难大多都随风而去了。我读这册回忆录，看他不断地反思，从幼小的生命到自己年长，他小时候读书，不喜欢被管理，因此逃课，宁愿在鸟窝里自由读书，这样才快乐；父亲送他到苏州学美术，因为不喜欢那种过于规矩的绘画方式，因此坚决转学到丹阳这样的小地方，这样才快乐；他读书参加学校的读书小组，因为不喜欢那种毫无创造性的读书方式，而坚决放弃，这样才快乐；他大学毕业到兰州教书，因为被自己不喜欢的人管理而苦恼，写信给傅雷，但回信说已经解决了，他越想越痛苦，于是便有了后来影响巨大的《论美》；他被打成右派，在荒漠上的农场劳动，后来借调到省城去绘画，再后来在敦煌研究所里工作，而外界早已经是处处风声鹤唳，但他还是用很细地纸张悄悄地书写自己独立的思考：“写人的价值，写人的异化和复归，写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写美是自由的象征。自知是在玩火，但也顾不得了。除了玩火，我找不到同外界世界，同自己的时代、同人类历史的联系。我需要这种联系，就像当初需要寂静与孤独。写起来就有一种复活的喜悦。”

因为有太多的不快乐，所以他就要追问。二十岁的那年，他在兰州的中学里教书，便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自己的命运，要由一些既不爱我、也不比我聪明或者善良的人们来摆布。为什么他们有可能摆布我们，而我们没有可能拒绝。”自此之后，他写下惊动一时的《论美》，从而完全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他人生所经历的一切苦难、折磨，似乎都是为了回答这样一个年轻时的提问而付出的代价。由此，他能够充满坚韧地去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下冒着危险去书写自己的思想，去探索这一天问的根源所在。而他一生所经历如此坎坷残酷的命运折磨，却因为这样一个微小的疑问所改变，苦难只有转化成精神的财富才具有价值，高尔泰正是真正将自己的人生财富转化成为了他对于人类生存的探索。因此，这册《寻找家园》读来才真正让人感到沉重，感到炽热，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命运史，它更可能折射出我们所有人的精神空间。为此，我觉得他的写作，已经不是单纯粹文学意义上的写作，不是“国家不幸诗家幸”的那种感慨，而是直接将写作直接指向了问题本质。以此与俄罗斯的索尔仁尼琴相比，我倒觉得中国的高尔泰能高出一筹。晚年的索氏回到自己国家，接受凯旋般的荣誉，发表种种并不高明的发言，以至于许多人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怀疑。或许他更多只是一种精神的标杆，他走得其实并不遥远。

塞林格与凯鲁亚克的两种“禅”

观察员 罗四鸽（上海，luosiling_china@163.com）

读塞林格的中短篇小说《抬高房梁，木匠们 西摩：小传》（丁骏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月），亦如其之前的两本小说集，《九故事》（李文俊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8月）和《弗兰妮与祖伊》（丁骏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9月），仿佛是读一本西方禅宗大师西摩与弟子们的习禅语录，记载语录的是他最忠实的弟子塞林格。小说没有故事，常常是几个片段和对话，如亦如禅宗语录，平白如话，幽默风趣，却又意趣盎然，充满了无厘头似的禅意，让人似懂非懂，却又难以释手。

西方的“禅”在大众的心目中，似乎与“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广结善缘，但因此也将塞林格归入到垮掉的行列，似乎就有些貌合神离的味道。这只需将凯鲁亚克里的“导师”贾菲（见《达摩流浪者》，梁永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7月）和塞林格的“导师”西摩，以及其“弟子”雷蒙（即凯鲁亚克本人）和巴蒂（即塞林格本人）相比较，便可发现二者所理解的禅相差甚远。虽然两人都提倡静坐冥思，崇尚自然追求自由，酷爱中国古代诗歌，但有着波希米亚式疯狂的凯鲁亚克，或在路上嚎叫，追求享乐、放浪形骸，肆无忌惮地抨击一切，禅似乎成为他“垮掉的人生”的借口和对“美国生活之道”的反抗武器。他那过于自觉、过于刻意、过于主管的禅，显得刺耳而毫无禅意。与凯鲁亚克愤怒地背着包在路上流浪，拒绝为消费而活不同的是，“脸上



总是有着恰如其分的微笑的”塞林格则是在琐碎生活寻找幸福，甚至厌恶旅行，更多地是在日常起居工作读书中，甚至是独居遁世中，冥思苦行，齐同万物，寻找心灵的自由和体验生命的幸福，解脱生死的羁绊。在他的书里，禅的声音低沉悦耳，似有还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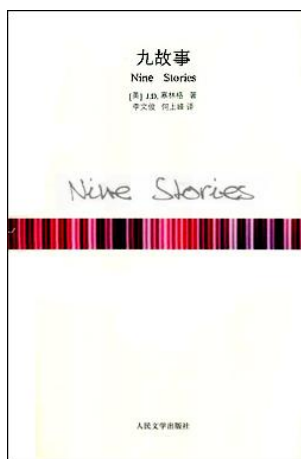
然，在孤凉峰上的雷蒙，在大自然的冥思中，终于顿悟，领悟到生命的空与实，寻找到了自由；而终日冥思、习禅讲禅，过着独自隐居生活的巴蒂，却不承认自己是禅宗佛教徒，更不是禅学家。在巴蒂眼中，唯一真正得“道”的禅师西摩，却神秘的自杀了。这不仅与垮掉派的禅大相径庭，也与我们所熟悉的“中国禅”貌似而实非，多了许多异域的色彩。其中原因似乎与六祖惠能一首偈子“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把印度的土产变成了中国的土产相似，从日本传入美国的“铃木禅”似乎也被美国弟子们本土化了。

正如美国禅学者艾伦·沃茨指出，西方人来说，要真正接受或是理解禅，“必须实实在在地与耶和华上帝以及他的希伯来基督教的良心彻底谈判成功，以致去取随意，而不至于有恐惧或反抗之感”。否则，“他的禅不是整（beat）禅，就是方（square）禅，不是反抗文化和社会秩序，就是一种新的阻塞和威望。”在艾伦看来，整禅的代表正是“垮掉的一代”，“假如禅不是被用作这种无奈生活的借口的话，那它也就成为别的东西。”塞林格在《西摩：小传》中也对其表示了嘲讽：“纯正的禅当然会比它的西方捍卫者们更长寿，这些推崇禅宗的西方人基本上是把禅宗洁身自好的基本要旨同心灵冷漠，甚至是麻木不仁混为一谈——这些人显然还不等自己的拳头变成金拳，就会毫不犹豫地一拳把菩萨打倒在地。”

从某种程度上看，一丝不苟遵守禅宗课程训练，强调日常经验，在日常生活中获得顿悟的塞林格的禅似乎更接近方禅。在他那里，禅不是全然的否定，而是用一种独特的肯定。而唯一真正掌握了这门艺术的只有西摩。

在西方人眼中，最早进入他们视野的铃木禅是哲学和三种不同文化的特殊混合物，它具有典型的日本生活方式，反映了印度的神秘主义和道家对于自然性和自发性的热爱，并贯穿了孔子思想的实用主义，其中最吸引他们的是道家的人本主义和禅的自然主义。这在塞林格倾注了最大笔墨、被视之为导师的西摩的身上，可以看到塞林格对禅的理解。

若将西摩的模样按巴蒂的白描画下来，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西方世界中的少年“庄子”形象：眼睛看上去有些斜视、鼻子大下巴短、耳垂肥厚、皮肤黑却干净、毛发重却过早秃顶、衣服总是不合身领带总是打不到位的其貌不扬甚至有些丑陋，整日没理由地兴致勃勃神采飞扬。而他教巴蒂打弹子的“不瞄准的瞄准”和扔烟屁股的“无人之境”的技巧，又让人想起当时亲到日本学禅的西方学者赫立格尔在其影响甚广的《箭艺中的禅》中所说的箭艺——随心之瞄准才能达到最高的箭艺，这又是禅宗精神所在。不过，西摩那不可思议的心、无与伦比的智慧、见首不见尾的举止言行以及神秘的自杀，又让他接近于印度佛教的理想人物——一种绝对掌握了自性的瑜伽徒，这和与常人无异、毫无奇特之处中国悟道禅人形象相比，显得更加神秘，远离普通人。或许正因为这一点，巴蒂虽然深深迷恋禅宗，崇尚道家，但他却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四流的瑜伽行者，一个西摩的追随者。



如果仔细区别格拉斯其他五位兄弟姐妹对西摩以及巴蒂态度，便可以隐隐看到当时禅在西方社会中的接受和传播情况。最小的两位弗兰妮与祖伊是格拉斯兄弟中仅次于西摩和巴蒂具有异秉的孩子，他们从小了接受西摩和巴蒂的教育，但内心深处，却无法摆脱对自己的深深迷恋。最后，弗兰妮精神崩溃，病倒在家中。祖伊清楚地看到弗兰妮的问题所在，最终的解决办法也只能是将西摩和巴蒂的“怪胎式的教育”派上用场：逼迫自己停止欲念。这或许也是祖伊和弗兰妮两人最后选择去做演员的重要原因。波波是格拉斯兄弟姐妹中异秉最少的一位，似乎是最幸福最正常的一个孩子，但在《九故事》中的《下到小船里》，隐约可以看到有着犹太血统的波波及其孩子，在世俗生活中受到的歧视和伤害。双胞胎兄弟中，沃特是格拉斯兄弟中除西摩外唯一真正快乐的孩子，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却神秘地死在日本，维克先是一名四处游走的记者修士，最后入寺修行，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63年发表了《天主教禅》的黑衣教团修士格雷厄姆。《九故事》中最后一篇中描写的另一个有着异秉的孩子特迪，深信前世和灵魂的升华，坚决摒弃逻辑与理性，并能进行神秘预言，最后的结局却生死不明。或许，塞林格用此来说明自己对当时出现的神秘主义的禅的态度。

ESSAY 随笔

西洋海盗与中土山寨

贾葭(北京, jiajia80@gmail.com)

旧历年底,电影《赤壁》下集终于要上映了。我对这个片子颇感兴趣,乃因片中笑料频出。上集里面,周瑜麾下有一员大将,名曰甘兴。余不之解,盖因东吴绝无此人也。诂料周瑜说,“甘兴甘将军和他的将士们,从前都是江洋大盗,不能随便开玩笑的。”我无意与导演开玩笑,但这个甘兴确是史所未书,颇有解释的必要。

从“江洋大盗”上去推断,这里的甘兴当是甘宁。甘宁字兴霸,时人以“锦帆贼”呼之。因为他的坐船以蜀锦为帆,这在当时算是十分豪奢的装备。甘宁纠集马仔,危害乡里,陈寿说他“于长吏界中有所贼害。”甘宁腰间悬一个大铃铛,很像海盗的号角,这点倒很光明正大。

《赤壁》剧本此处的另一硬伤是,“江洋大盗”这个词汇,晚至明季才出现。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九云:“小妇人父及夫,俱为江洋大盗所杀。”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二十一回说,“他一向本是江洋大盗,因他善于使船,专能抢上风,撘顺水。”作为江洋大盗的甘宁,与后世的同行相比,令人不免有名不符实之讥。甘宁作案还是小儿科,为害乡里之烈,尚不若周处。

在东方语境之中,江洋大盗已是为害甚烈,但与西洋之海盗相比,显是小巫见大巫。西洋历史上,对海盗之记述可谓史不绝书。在西方文学作品中,海盗多是瞽目持刀之徒,飘零海上,劫船为业。近月以来,各国商船,皆为索马里海盗所累。吾国已出兵船护航,为前所未有之举。

自人类有海上航行以来,便有海盗这种古老之职业。爱琴海文明与东亚大陆文明的区别,自是以海为界。早期的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帝国,多受海盗之累,终究没能在地中海扩大自己的统治。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开始,约是中国的战国时代,罗马人就在对付科西嘉岛以及撒丁岛上的海盗。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就描述过海盗。

从词源上去考察,海盗 pirate(peirato)这个词,早在大概公元前140年,就被古罗马的史学家波利比奥斯第一次使用。希腊史学家布鲁达克在公元100年左右,给海盗行为下了最早的明确定义。他形容海盗为那些非法攻击船只以及沿海城市的人。公元9世纪到11世纪的挪威掠夺者不被称为海盗,人们叫他们“丹麦人”或者“维京人”,在中世纪的英格兰,这个词的意思是“海贼”。

现在 pirate 这个词尚有另一个意思,即“盗版”之意,不知何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倒与中国当前的一个热词“山寨”同意。既然 pirate 是“海贼”,吾国的山寨版,就是“山贼”,这与吾国之“江洋大盗”又是同一拨人。当然,这仅仅是中西语意上的巧合,按汉语词汇释义而论,水面之大小,依序为洋、海、江,但吾国有“江洋大盗”,却唯缺“海盗”。

乍看上去,中国海盗横行海上之时,也是麦哲伦等西方海航先贤列土辟疆之日。西方的海盗,真正纵横五洋之时,是16世纪。航海技术的巨大发展,使得欧洲人此时才从大西洋和地中海上漂出来,这才是真正全球化的开始。人类的文明进程,似乎在各处进程差相仿佛。

地中海当然要算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也是早期海盗横行的主要区域。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大帝也想清剿海盗,但历次无功而返。这与中国的中原王朝清剿山贼相仿,都属于官方部队和山寨悍匪的作战。西方是海战,中国是陆战。冷兵器时代的海战多是登船作战,箭簇齐发,很像火烧赤壁的草船借箭。

在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甚至也没有地中海上的海盗有所收敛。来自西里西亚的海盗,比罗马帝国的官方海军还要强悍一些。他们拥有战船上千只,罗马帝国的舰队不在话下。说到此处,我总觉得,西方海盗虽然名声在外,令恺撒大帝都闻风丧胆,但终究格局太小。

即以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孙策征西为例,《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中说,“策轻军晨夜袭拔庐江,勋众尽降。”降了多少人?黄仁宇说中国人向来缺乏数目字管理,因此陈寿也没告诉大家。后来有人考证出此役缴获战船六千艘,这还是在长江上!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倒是提到荆州刘表的战船之数。张昭在向孙权劝战的时候说,“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张昭多少

有点吓唬人，但刘表的水军的确不可小觑。

扯远了。恺撒公元前 78 年为海盗所擒，被囚四十余日，被其引为奇耻大辱。海盗们看见恺撒完全是一副公子哥儿的装扮，立刻狮子大开口，赎金要 20 个塔兰特黄金。恺撒大手大脚惯了，面对漫天要价几乎不会坐地还钱，说我可以给 50 个塔兰特。一个塔兰特合今日 26 千克，这赎金就是 1300 千克黄金！按照上海黄金交易所近日的价格，这些黄金大约值人民币 2.44 亿！

想必恺撒当年也像孙权一样砍翻了一张桌子，“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不过他还是缴了赎金，不过像警察赎人质一样，赎金又拿了回来。当时元老们都觉得若非庞培出马，地中海恐永为海贼所乱。于是他派庞培将军前往清剿。出动士兵 12 万人，战船 500 余艘，历时两月，清剿海盗，共虏敌两万余人，缴获 400 余艘。从此地中海到 16 世纪，都没有海盗出现。

那时候的海盗名气没有现在这么坏。《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修昔底德，还不认为这是一个很不道德的职业。他说“（在当时）不只是希腊人，还有住在沿海一带和岛屿上的异邦人，都把海上劫掠作为共同的事业”。冷兵器时期的武装民船与官方舰队，实在是很难分出高下，总之，官方的就是舰队，山寨版的就是海盗。这当然也是“成王败寇”的道理，官方舰队攻城掠地之时，干的何尝不是海盗的勾当。

修昔底德还举例说：古时候的人们遇见海上来的陌生人时，经常会问“你们是海盗吗？”对方也不觉得是一种冒犯。《奥德修纪》三卷 73 行以下，特洛伊战争后回到派罗斯的老将涅斯托尔，遇见渡海外出寻找父亲奥德修斯的忒勒马科，就问他：“你们是谁，陌生的来人？是为了生意出航，还是任意远游，像海盗那样……”忒勒马科也不以为意。

1521 年，西班牙舰队攻克墨西哥后，将掳掠的大量金银装上三艘帆船，派回马德里覆命。这些船在亚述尔群岛海域遭到法国海盗头子让·弗勒里的进攻。欧洲的海盗们第一次看见美洲的黄金，乐不可支。

也就是在这一年，麦哲伦在菲律宾被土著居民以标枪掷死。这很像游戏《帝国时代》中的掷矛战士，顺便说一句，这一款游戏中，维京人的战船是最强大的。在欧洲大陆还没有看见美洲的财富之时，就已经有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水手们，前往美洲展开寻宝之旅。这种探究海洋的勇气当然成就了殖民时代。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对海盗的形象总是付诸浪漫主义的描述，这当然与海盗的开拓精神有关。这些四海为家的海上强人，总给人十分惊喜的感觉。也许是因为 17 世纪地中海的海盗盛行，拜伦 1814 年的诗集《海盗》在发售当天，便卖出一万册。这个数字或许是韩寒都难以企及的。拜伦之后，海盗的形象便频频出现在戏剧与芭蕾之中。这也很像中国关于山贼的戏文，比如《李逵探母》。

1883 年英国作家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出版的小说《金银岛》，使得船头海盗的形象赫然高大起来。海盗在此后的形象，总是与酗酒、女人、黑眼罩、假肢、鹦鹉相关。西方海洋文明诞生了海盗文化，并将其美化。近年来的电影《加勒比海盗》便是一例。

相比之下，东方的江洋大盗的格局就比较小。中国人的概念中，“海”是与“河”、“湖”联系起来的，是万川之归，不像西方海洋文明中，那是一个神秘而富有挑战的所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对海洋是很缺乏认识的。即便“洋”这个字，也是后期才有大海之意。《尔雅·释诂篇》中，郝懿行的义疏引颜师古《匡谬正俗》云，“今山东俗谓众为洋，按以洋为多，古今通语。”可见洋是多的意思。《尚书·禹贡》说“江汉朝宗于海”，着眼点还是在内陆。

中国人似乎对海的兴趣从来就不大。《管子·海王篇》说，“藉渔盐之利，富国称王。言以负海之利，以王其业。”这里的关心对象是渔盐，跟海盗的差别太大了，这是渔民的境界，活动范围基本是近海，稍微远一点的话，一则是怕，二则也无兴趣。中文里，稍微大一些的湖泊也叫海，如孟子的“挟大（读若泰）山以超北海”。后来蒙元时代，将北京城内一千湖泊均称为“海”。

佛教传入中国后，海被蒙上一层神话色彩。李德裕《赠圆明上人》诗曰，“远公说易长松下，龙树双经海藏中。”说的就是龙树菩萨与华严经的故事。王安石《寄福公道人》曰，“楼依水月观，门接海潮音。”用的是《楞严经》的说法。一些典籍还将“海”作为无法认知的代名词，比如浩如烟海、学海无涯等，使得中国人“望海兴叹”。

大约也是因此，才有“天涯海角”的说法。最早的说法出自南朝徐陵的《徐孝穆集》：“《武皇帝作相时与岭南酋豪书》：天涯藐藐，地角悠悠。”现在我们知道，三亚天涯海角的那个地方，不过是中原王国能够到达的边地而已。宋代张世南的《游宦纪闻》说，“今之流宦及远服贾者，皆曰天涯海角，盖俗谈也。”这里的天涯海角，就有了“江湖”的意涵。

中国人习惯把江与湖并称。庄子说“相忘于江湖”，《史记·货殖列传》里说“范蠡乘扁舟浮于江湖”，这都是实指。后

来的江湖才有语义上的变化。《高僧传》载，法汰和尚被道安和尚派往江南，临别时说，“法师仪轨西北，下座弘教江南，江湖道术，此焉相忘矣。”这个江湖，就是杜牧“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的江湖，也是江洋大盗的那个江湖，是大家的一个交际圈，好比现在的演艺界、文化界一样。

行走江湖之人，居然被称为“海客”，这大约是“海内兄弟之意”。李太白《江上吟》曰，“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就是此意。唐代张固的一个段子说，牛僧孺早年投奔长安，被人“以海客待之，怒而去。”只有“海客谈瀛洲”的时候，说的才是“烟涛微茫信难求”，气度如李白者，也难觅其对海的兴趣。

吾国文化文本中，江湖上的江洋大盗，多半与山寨有关，也被称为“山大王”。《水浒传》第五回：“近来山上有两个大王，扎了寨栅，聚集着五七百人，打家劫舍。”《西游记》第十六回：“这里正东南有座黑风山，黑风洞内有一个黑大王。”占山为王与据海为盗，正是中国与西方大盗的不同之处。中国没有海盗的传统，只有宋江、方腊、韩山童这样的“陆盗”。西方海洋文明与我中土文明之差距，管窥而见矣。

明清两代，官方还有海禁之举。有海禁之后，才有中国的海盗。郑芝龙便是其中大者。清代袁昶诗云：“篙工舵师卧江沙，海禁久弛吞声哭。”若非海禁久弛，哪有郑芝龙以及郑成功父子的成功。这比江洋大盗的级别可就高很多，我们知道，延平郡王那里就是个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海盗一旦被招安，就是国家的正规海军。1935年之时，中华民国的刑法还有海盗罪这个罪名。

如今索马里的海盗相比郑芝龙，却又差了一截，据说他们连鞋子都不穿的。BBC 记者玛丽·哈珀居然采访到劫持“天狼星号”的海盗。她的女儿可能看过本国作家的《金银岛》，在母亲给海盗打不通电话后，这个12岁的小姑娘打通了，“喂，我可以与海盗说句话么？”也许是这稚气未脱的声音打动了海盗，BBC 做了对海盗的独家访问，一时传为媒体美谈。

联合国在2008年6月通过1816号决议，授权外国军队在索马里政府同意前提下，自行进入索马里海域，从事护航和海盗打击活动。但决议给予了6个月的过渡期。索马里海盗挣钱的日子不多了，近日才会这般猖獗。但如同中国当年的山寨一样，索马里海盗成为流寇，也与其国内政治动荡有关。治标在海上，治本却需政治清明、流民各有所安。这也许也是西洋海盗与中土山寨的另一个共通之处吧。

IMAGE 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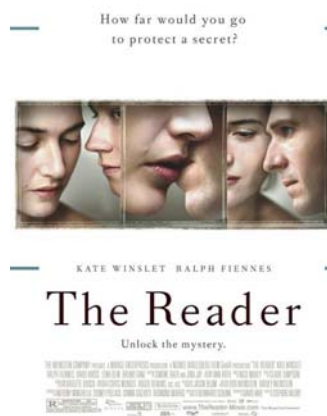
打毛线的屠杀者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xy1978@hotmail.com）

因为《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倒了胃口，差点错过其他奥斯卡获奖影片，比如《朗读者》。《朗读者》开场40多分钟都是在讲一个36岁的女售票员汉娜和一个15岁的男孩的忘年“交”。这种情节并不新鲜，三、五年就会出现一次，1997年的《教室别恋》、2001年的《钢琴教师》、2007年的《穿裘皮的维纳斯》，主角都是女教师和男学生，最后一件在国内最为轰动：一个男生刚刚过完18岁生日，就刺死了另一个男生，这起校园凶杀案的起因是“情杀”，他们共同的女朋友是44岁的女班主任，最后女班主任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朗读者》的特色在于调情方式是“朗读”，男孩给少妇朗读《奥德赛》、《战争与和平》。直到有一天，这个男孩来到汉娜的房间，发现人去楼空。汉娜很符合文艺男青年对文艺女青年的想象，轻轻的走，正如轻轻的来，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是《朗读者》的“前戏”，虽然我对这种前戏并不反感，也很有兴趣欣赏女主演凯特·温斯莱特的身体，可是相对整部影片来说，“前戏”显得太长了。

电影的重点是后半段，两人再次重逢的时候，情感故事升华为思想事故。男孩成为法学院学生，观摩一场审判，却发现汉娜是审判席上的被告，她曾经是个党员，纳粹的党员，在一起犹太人死亡事件中担任看守。整部影片最让我震惊的不是男孩与少妇的忘



年“交”，不是少妇隐瞒的党员身份和文盲秘密，也不是少妇在已经成长为男人的男孩帮助下成功扫盲的“小团圆”，性、大屠杀和监狱里的童话都是过于熟悉了的情节。整部电影，最让我耿耿于怀的是一位打毛线的屠杀者。诗人多多曾经写过一句诗：“两行新栽的苹果树，刺痛我的心。”在《朗读者》里，“两行新打的毛线衣，刺痛了我的心。”与汉娜一起坐在审判席上的当年的女看守们，表情仿佛她们穿过的制服，清一色的冷漠，一切都与她们无关，包括这场审判，包括那场屠杀，其中有一个还在忙着打毛线，她们只有在推卸责任的时候会激动起来。

打毛线的屠杀者，这是一个怪异的组合。毛线象征着温情，打毛线者多半是贤妻良母，屠杀是恶中之恶，屠杀者通常被视为魔鬼。在我们的概念里，这两者永远不可能发生关联。贤妻良母和屠杀者必然是冲突的么？它们会融为一体么？这不仅是电影，也是整个二战给人类提出的难题。在男孩给汉娜朗读的书籍中，最多的是那些文学名著，其中有一本或许会被忽视，就是雅斯贝尔斯的《德国罪过问题》。雅斯贝尔斯，著名德国哲学家，他区分了四种罪过：刑法罪过、政治罪过、道德罪过、形而上罪过。《朗读者》显然受到雅斯贝尔斯的影响，但是导演似乎故意隐瞒了另一位思想家的身影——汉娜·阿伦特。

汉娜以工作为由，表示自己仅仅是遵从命令，服从命令听指挥就像打毛线一样，常常被视为一种美德。1960年，曾经在大屠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艾希曼，在阿根廷隐姓埋名多年，被以色列特工抓捕归案，次年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雅斯贝尔斯的学生、另一位著名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学生兼情人、20世纪最重要的女哲学家阿伦特，应《纽约客》杂志之约抵达审判现场，她发现简单地把屠杀者称作无恶不作的魔鬼，对于反思大屠杀并无帮助，因为每个人都不会认为自己是魔鬼，都觉得自己要比艾希曼清醒，会从魔鬼身边走开或者拒绝成为魔鬼。恰恰相反，她指出艾希曼可能是一个模范父亲、温柔的丈夫、称职的公务员，可是这些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屠杀者。

阿伦特发现“平常的恶”，这种恶潜伏在每个人的身上，在一个正常的年代，它可能是个美德，可是在一个非常年代，它可能是恶的使者。一个售票员，认真地售票，不放过任何一个逃票者；一个看守，认真地把犹太人关押起来——这都是认真，可是结局迥异。无所事事的时候打毛线，这是一种温情，像打毛线一样按下屠杀的按钮，这是一种冷漠。正是因为屠杀像打毛线一样简单，甚至像打毛线一样具有服从的美德，所以屠杀会畅通无阻。汉娜为了自己的尊严，拒绝透露文盲的秘密，承担责任，因此被判终身监禁，在别人的生命和尊严面前，她却表现出打毛线式的冷漠。汉娜并不缺乏勇气，可是因为缺乏思考和判断，勇气没有在最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按照雅斯贝尔斯的分析，她或许可以免于刑法罪过，或者从轻处理，但是在道德罪过上，她难辞其咎，尽管她拥有一些平常的美德，可是平常的美德也是“平常的恶”，“平常的恶”的结果并不平常，可能是一场大屠杀。

《朗读者》当然无法和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相提并论，反思被性和童话包裹，这也是电影的无奈，需要用糖衣包裹思想的药。有人爱吃糖衣，有人会被思想的药吸引，各取所取，这不是坏事。只是爱吃糖衣的观众，要小心自己成为打毛线的屠杀者。《朗读者》的另一个中文名字是《生死朗读》，朗读或者阅读，有时确实事关生死。

IMAGE 影像

如何挠到公众的笑穴

特约撰稿人 孙晓骥（北京，seismometer2006@yahoo.com.cn）

话剧《罗密欧与祝英台》2008年在北京上演时，据说场场观众爆满，加演成了主办方的家常便饭。不过当时我尚在国外，且并非宁财神与《武林外传》的拥趸，故未加留意。今年回国，该剧仍火，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进入剧场一观。有媒体将之形容为一出当代的“悲喜剧”，而作为一名“迟到”的观众，我在剧情的“悲喜”之外更感到话剧在流行文化中的处境，很山寨，也很无奈。

昏暗的舞台将故事带回1998年的纽约，满头银发的祝婉莹坐在轮椅上，嘴里念叨着一出名为“罗密欧与祝英台”的并不存在的戏剧。从她记忆之门呈现的，是自己1937年在上海外滩与沦为黄包车夫的爱国学生罗锅的偶遇……

接下来的情节不难叙述：家世显赫的祝婉莹与罗锅两人从相互好奇进而情窦互生。然而处于日寇统治下的上海，爱情

总是如风中之烛。罗锅的朋友得到了国宝佛头，为了保护国宝，罗锅和祝婉莹遭到日本人的追捕利诱。在最危急的关头，罗锅选择用生命来守护国宝的秘密。单由剧情看来，这出悲喜剧所体现的，似乎只有“悲”，“喜”的部分又在哪里呢？

实际上，在那个短暂的“序幕”之后，观众的笑声几乎充斥了整场戏的演出，剧中设置的大量搞笑桥段和喜剧机关，让人不由得想起同样“恶搞”的话剧《武林外传》。本来，《武林外传》和《罗密欧与祝英台》就是宁财神“缘定三生”爱情剧的头两部，二者剧情上的承接关系不言而喻。而当你听到剧中斧头帮老大说出“你让我这张老 face 往什么地方摆”这类典型“武林外传”式的句子时，想憋住不笑，很难。问题是，仅凭剧中大大小小的“段子”，此剧便能火上一整年、让观众笑上一整年，着实有些费解。

横看竖看，《罗密欧与祝英台》可以像周星驰的电影、像本山的小品，甚至像一次超长的脱口秀，但怎么看怎么不像一出正经的话剧。可是，假如今天上演的是莎翁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还会有那么多人前来捧场吗？真的很难说。至少我就更愿意在伦敦，而不是在北京或上海观看任何与莎士比亚有关的剧目。

而当我们剔除了与莎士比亚的元素以后（实际上也许根本没有），剩下的就一幕了然了，一场大众文化的盛宴随着剧情的发展像走马灯一样在观众眼前流动：印度警察模仿 Vitas 唱歌让人联想到《全民大闷锅》里九孔对 Vitas 的模仿，斧头帮的舞蹈几乎照搬《功夫》，而在罗锅拿出五百大洋的银票时我们又仿佛回到了《大话西游》的场景，至于剧名，显然是取自曹格与卓文萱的《梁山伯与朱丽叶》。综艺节目、香港电影、流行音乐甚至手机广告在舞台上汇聚，逗乐了场下的观众。有趣的是，我们在为此类大众文化“混合物”笑得前仰后合的同时，却很可能对莫里哀喜剧中的强烈冲突与讽刺无动于衷。

这似乎不单纯是一个审美疲劳的问题，更涉及到如今我们对“好笑”的定义。亚里士多德流传千古的《诗学》唯独“喜剧”一卷散佚，可见关于何为“好笑”，自古便无定论。在这个消费社会，繁重的压力使得现代人在生活中不堪重负。我们的笑不再是出于内心的喜悦，而是一种需要，希望以大笑暂时忘却烦恼与俗务，获得轻松。导演何念也表示，此剧的初衷无非是“博观众一笑”。

后现代主义的“戏仿”、“反讽”，在今天已经显得很老土，而一种“拿来主义”的山寨式喜剧更能挠到我们的笑穴。媒体研究者亨利·詹金斯曾将电视消费者比喻为大众文化的“盗猎者”，不仅消费，而且直接参与文化的生产。换言之，我们不仅渴望快乐，还渴望能自己制造快乐，于是，插科打诨的台词中塞满了身边俯拾即是的时尚元素，“为我所用”的原则超越了所有的戏剧原则。虽然这样的 DIY 舞台剧不再是什么正统喜剧，但没听说过莫里哀与佩多，并不妨碍我们发笑，正如听不懂马勒的交响乐，并不妨碍“我们住在马勒隔壁”成为 MSN 签名。

回到舞台，罗、祝二人在剧中上演着朱丽叶在凯普莱特家花园对月抒怀的那场戏。当罗锅说出“多么美好的夜啊。我真害怕，这是一场梦”时，我看见“饰演”朱丽叶的祝婉莹轻轻地抹了一下眼泪。与空洞的笑声相比，这眼泪更为真实。或许，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吧，在戏剧的盛宴与让人哭笑不得的现实之间，点缀着零星的小感动。



TRANSLATION 译介

吉姆·霍特：你背诗么？

吉姆·霍特 (JIM HOLT)

翻译：陈丹丹（南京，Cheryl@live.cn）

我从几年前开始天天背诗，现在已经背了百来首了，包括一些很长的诗——总共两千多行吧，打油诗和鲍勃·迪伦的歌词不算在内。我会在绕着哈德逊河慢跑背诗给自己听。要是身边没什么人，我就大声地背出来。在曼哈顿办事时我也会这么做，不过声音要放得轻一点——像在用蓝牙耳机讲电话一样。

这么做即便不是自讨苦吃，至少听起来也挺怪异。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婴儿潮出生的人，或者比我年龄更大，你的高中英语老师很可能强迫你背过诗，用于课堂朗诵。我们那会儿可是哀号着抗议啊！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我可以把你比作夏日吗？”，甚至是用中古英语背《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前 18 行究竟有什么意义？老师的回答不能令我们满意，她顶多数衍塞责地说什么“文化上自信”之类蠢话。但我们还是得忍着痛，用机械重复(*rote repetition*)的办法大段大段地背诗。（“机械”这个词本身就有着折磨的意味，因为它是从拉丁语 *rota* 来的，意思是“车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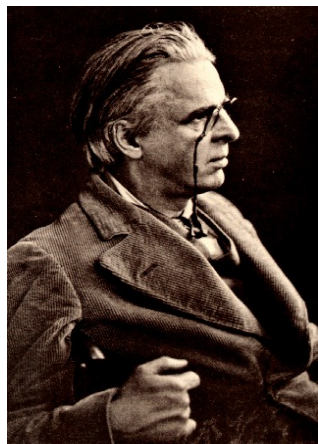
走运的人似乎可以毫不费力地背出一堆诗来。乔治·奥威尔就说，如果一段诗文“真的很上口”——T.S.艾略特的早期诗作对他来说总是如此——他就能在读了一次后背出二三十行。博斯韦尔（Boswell）所记载的塞缪尔·约翰逊也有类似的记忆天赋。克里斯多夫·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似乎也能潜移默化地吸收诗歌。他在脑中储存了一小本诗选，据他的朋友伊恩·麦克韦恩说，所有的诗歌都能“随时从他的脑神经上取出来”（也许他是在聚会结束，客人们昏睡的深夜用功背诗的吧）。理查德·霍华德（Richard Howard）有次跟我说，他是在儿时逐渐适应记忆的习惯的：那会儿他每背一首诗，父母就赏他一毛钱。

对于我们其他人而言，轻松记忆诗歌的关键在于一点一点地去背。我每天早饭前都会往脑中塞几行诗，接上我以前背过的那些。现在我已经背了 22 行丁尼生的《尤利西斯》，后面还有 48 行。以这种悠闲的速度，我大概得花一个月才能背完整首，但到最后我会拥有一大堆诗歌不动产，供我重访、漫游。

记忆诗歌的过程起初是相当机械的。假如一首诗有在音步和韵脚上有规律，你就抓住这个不放，歌唱般大声朗读诗行。至于这首诗的意义，你不用想太多。但是接下来，一种有机的反应发生了：表演代替了纯粹的记忆。你开始感受到一种张力，存在于诗歌抽象的音步（比如五步抑扬格）和由词语意义而产生的节奏之间。（叶芝和蒲伯的部分天才就在于他们可以通过对抗韵律来增强意义。）这是一种生理上的感觉，而且很令人愉快。对着书读诗的时候也能得到类似的快感，但如果词语来自内部，感觉就会强烈地多（阅读行为本身有破坏生理快感的倾向）。这种区别就像是视奏一首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和背谱弹奏一样——后者总让你觉得更能抒发作曲家的情感。对于诗歌，你连钢琴都不需要。

这就是我背诵诗歌的情况：完全是出于享受。而且这种享受得来容易。任何一本像样的选集里都有可供遨游的海洋。假如没有保留大学时代的诗选，你也可以去随便哪家好书店看看新书或二手书，好的版本层出不穷——牛津、企鹅、诺顿……每本只消几美元。或者你可以试试《不可或缺的愉悦：为朗读而选的诗集》ESSENTIAL PLEASURES: A New Anthology of Poems to Read Aloud (Norton, \$29.95)，编者是前桂冠诗人罗伯特·平斯基（Robert Pinsky）。

但是，选什么诗背呢？我自己是从奥登的《此月之美》（*This Lunar Beauty*）开始的，史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称这首抒情小诗为奥登最美的作品。接着我又试了勃朗宁的戏剧独白《我的前一位公爵夫人》（*My Last Duchess*）——一首 56 行的纳博科夫小说。勃朗宁虽然算不上是一流诗人，背他的诗却特有意思，因为他的语汇和措辞很有异国情调。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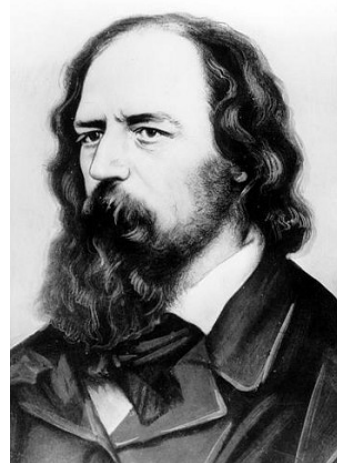


叶芝

从长度上讲，我最有野心的尝试是勃朗宁的《去黑暗塔的罗兰少爷来了》（*Childe Roland to the Dark Tower Came*，碰巧是史蒂芬·金的最爱）。背诵这首 204 行的诗要花 10 分钟的时间，正好够我从公寓走到洗衣房。

到现在，我头脑中的诗歌库差不多可以从乔叟下溯到当代了。（丁尼生是最后一个大缺口，我正在填补。）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莎士比亚、济慈和叶芝身上（他的象征戏法终于对我产生意义了），还有一堆讨人喜欢的陈腔老掉诸如《致羞怯的情人》（*To His Coy Mistress*）、《忽必烈汗》（*Kubla Khan*），以及不少轻松的韵文（比如一首长诗，写的是一只当上了出色的外交官的鸭嘴兽，后来因为下了一个蛋而羞辱得辞了职。）尽管对当代作品关注不多，我背得最好的一首却是理查德·维尔伯（Richard Wilbur）的《西亚拉别墅的墙壁喷泉》（*Baroque Wall-Fountain in the Villa Sciarra*）。我的记忆力一开始并不适合这首诗微妙的节奏，但当我终于把它背下来以后，我就开心得不得了，给维尔伯去了封崇拜信。

他在回复我时说，自己总是建议学生们背诵诗歌：“当你在公交总站或散兵坑里被耽误的时候，脑海中有个诗歌选集可供消遣是顶好的事。”



丁尼生

不过对于背诗能手宣称的一些好处，我们却要怀疑。罗伯特·平斯基曾说“很难想象背了很多诗的人会写不出连贯的句子和段落来。”大卫·布罗姆维奇（David Bromwich）回应道：且看看马龙·白兰度的自传吧，他可是背过一大把莎士比亚的。

会有认知能力上的好处吗？我有时觉得自己的记忆力是在增强了，但这很可能是个错觉。“记忆诗歌确实似乎对人们记忆诗歌有所帮助，”杰弗里·南恩伯格（Geoffrey Nunberg，语言识别专家）观察道：“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技能可以转移到别的任务上去。”

我也没觉得背诗能使人更受欢迎。事实上正好相反，没人愿意听你慷慨激昂的朗诵——反正几乎没有吧。确实有个在华尔街做债券生意的朋友很喜欢听我背诗。有次他带我去位于曼哈顿中城的大哈瓦那雪茄俱乐部，专注地坐着听我吟咏“白昼的不洁的景象退去……”，他冲一位极为漂亮的女招待喊道：“到这儿来，听我的朋友朗诵叶芝吧。”哦，天哪！

对诗歌背诵最伟大的赞颂来自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他本人的脑海中就有惊人的诗歌储备。在他的书《文化健忘》中，詹姆斯宣称“全人类所共有的未来取决于重建一个简简单单的理想：那就是背诗。”很崇高的观点。我只希望詹姆斯能给出几点让我们信服的理由。

我自己是给不出理由的，但我想至少澄清以下三个误解：

误解之一：背诗很痛苦。其实每天记个一两行，你一点都不累。

误解之二：我的记忆体没有足够的空间放诗歌。很差劲的比喻。记忆是肌肉，又不是储物罐。

误解之三：每个人都需要 iPod。你可以不用 iPod 的，用背诗来代替它吧。

（原载 2009 年 4 月 2 日《纽约时报书评》）

搜狐新闻

news.sohu.com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敬请来信告知。

独立阅读主页：<http://chinairr.com.cn/>